

# 1650 年廣州「庚寅之劫」—— 原始文獻與歷史記憶

董少新\*

關於 1650 年廣州庚寅之劫，目前所見的原始文獻主要有三種，一是尚可喜、耿繼茂《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二是番禺王鳴雷《祭共塚文》，三是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韃靼人攻陷廣州城記》。三份文獻的作者均為庚寅之劫親歷者，分屬征服者、被征服者和來自歐洲的「旁觀者」，因此這三份原始文獻對該事件的敘述各有側重，且表現出作者的不同立場。這三種最原始的文獻在後世衍生出三個不同的文獻系統，幾位原作者的立場在後世分別得到延續，並形成了關於廣州庚寅之劫的三種歷史記憶。本文呈現並分析了三份原始文獻的內容差異，梳理了三份文獻在後世的演變，以及由此形成的關於庚寅之劫的不同歷史記憶。

關鍵詞：廣州庚寅之劫、原始文獻、文獻立場、歷史記憶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

## 一、前言

明清鼎革之際，廣州兩度淪陷。1647年1月20日(順治三年，隆武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李成棟(?-1649)、佟養甲(?-1648)率清軍突入廣州，屠城三日，<sup>1</sup>紹武政權覆滅，永曆帝(1646-1662在位)逃離肇慶，進入廣西。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四月，李成棟因不滿清廷僅封其為兩廣提督，卻封佟養甲為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而易服改幟，歸附永曆朝，被封為廣昌侯，不久又晉封為惠國公，掌兩廣總督印。南明朝野士氣大振，不僅堅守嶺南一時無虞，北伐復明也現希望。永曆帝於是於八月初從南寧返回肇慶。次年三月，李成棟兵敗於江西信豐，撤離之時落水身死，杜永和(?-1667)接任兩廣總督。

與此同時，清朝亦加速了南征步伐，順治六年(1649)五月，清廷封孔有德(?-1652)為定南王、耿仲明(1604-1649)為靖南王、尚可喜(1604-1676)為平南王，令孔有德率兩萬兵力攻取廣西，耿仲明、尚可喜率兩萬兵力撲向廣東。十一月，耿仲明因收留「逃人」畏罪自殺，耿繼茂(?-1671)以

---

<sup>1</sup> 中文文獻對此記載甚少，但西文文獻中卻言之鑿鑿，云此次屠城持續三日，至少有一萬五千人被屠殺。義大利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當時在廣州城內，親歷了此次劫難，遭到清兵毆打，險些喪命。畢方濟將此次經歷記錄下來，向剛抵達澳門的耶穌會日本—中國巡按使阿澤維多(Manuel de Azevedo, 1581-1650)彙報，後者將畢方濟等內地傳教士提供的資訊匯總，編成一份長篇報告。見 Manuel de Azevedo, *Relação das guerras, e levantam.<sup>105</sup> que Ouve na China, morte do seu éperador, e entrada dos Tartaros nella, desdo anno da 1642 até o de 1647, do Visitador da Prov.<sup>a</sup> de Jappão, E da Vice Prov.<sup>a</sup> da China*. Biblioteca de Ajuda (葡萄牙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以下簡寫為 BA), *Jesuítas na Ásia*(《耶穌會士在亞洲》檔案，以下簡寫為 JA), 49-V-13, fls. 1-49; ARSI(羅馬耶穌會檔案館), Jap.-Sin. 126, fls. 79-127.

阿思哈哈番職位統率其父舊部。<sup>2</sup>十二月二十八日，清軍翻越梅嶺進入廣東，於除夕夜攻克南雄，盡屠城內居民。順治七年(1650)正月初六日，尚可喜、耿繼茂率清軍抵韶州，未遇抵抗而佔領之，隨後一路南下，攻下清遠、從化諸縣，二月初六日(3月7日)清軍已來到廣州郊外。尚可喜、耿繼茂試圖招降杜永和，遭到嚴詞拒絕。初九日，清軍強攻城北，在明軍頑強抵抗下大敗。在此情況下，尚可喜、耿繼茂決定圍城。圍城期間，清軍掘濠、鑄炮，聚集援軍，在清遠再次擊敗明軍，並攻下三水。經過約九個月的圍城後，十一月初二日(11月24日)尚可喜、耿繼茂下令攻城，以數十門火炮攻破廣州城西北城牆，杜永和棄城乘船逃走，廣州徹底淪陷。清軍隨即屠城，造成南明軍隊和廣州居民大量傷亡，史稱「庚寅之劫」。

關於庚寅之劫，目前能夠找到的原始文獻不多，主要包括：(一)尚可喜、耿繼茂《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二)番禺王鳴雷(生卒年不詳，隆武元年[1645]舉人)《祭共塚文》；(三)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 1585-1658)《韃靼人攻陷廣州記》。三份文獻均作於事件之後不久，作者均為事件親歷者，分屬征服者、被征服者和來自歐洲的「旁觀者」，表現出不同立場，又因為身份和所持立場不同而對該事件的敘述各有側重。其他親歷者如守城方的杜永和、攻城方的何景貴等，或未記錄此事經過，或有記錄而未留傳至今。目前所見的這三種最原始的文獻，在後世衍生出三個文獻系統，如《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的基本內容載入《平南王元功垂範》、《尚氏宗譜》等；王鳴雷《祭共塚文》部分內容被鈕琇(1644-1704)《觚賸》、仇巨川(?-1800)《羊城古鈔》收錄；而曾德昭《韃靼人攻陷廣州城記》為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韃靼戰紀》、尼霍夫(Johannes Nieuhof, 1618-1672)《荷使初訪中國記》所徵引。三

<sup>2</sup> 參見顧誠，《南明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頁430-431。

種原始文獻的原本立場在後世分別得到延續，並形成了關於廣州庚寅之劫的三種歷史記憶。

最早研究庚寅之劫的是英國人包臘(Edward Charles Bowra, 1841-1874)。<sup>3</sup>1872-1873年，他在英文期刊《中國評論》上發表〈滿洲征服廣州〉一文。<sup>4</sup>該文使用了魏源(1794-1857)《聖武記》、蔣良騏(1723-1788)《東華錄》、仇巨川《羊城古鈔》、阮元(1764-1849)《廣東通志》、瞿共美《東明聞見錄》等中文文獻，及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中華帝國全志》、<sup>5</sup>閔明我(Domingo Navarrete, 1618-1689)《論君主制中國的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sup>6</sup>衛匡國《韃靼戰紀》和尼霍夫《荷使初訪中國記》等西文資料。<sup>7</sup>儘管包臘沒有使用三份更為原始的文獻，但作為 19 世紀來華的英國人，其所使用的史料已令人嘆服。包臘對當

<sup>3</sup> 1863-1866 年間，包臘在天津、上海、廣州海關工作，1867 年任職寧波海關，次年將《紅樓夢》前八回翻譯成英文，展現了中文功底。1871 年重回廣州，任粵海關負責人。關於包臘，參見 Charles Drage, *Servants of the Dragon Throne: Being the Lives of Edward and Cecil Bowra* (London: Peter Dawnay, 1966); 該書有中譯本：查理斯·德雷格著，潘一甯、戴甯譯，《龍廷洋大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包臘檔案」(Bowra Papers) 四盒七卷，藏於倫敦亞非學院(SOAS)圖書館。

<sup>4</sup> E. C. Bowra,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anton,"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1: 2 (September 1872): 86-96; 1: 4 (February 1873): 228-237.

<sup>5</sup> 包臘使用的是該書的英譯本，Jean Baptiste Du Halde,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London, 1738).

<sup>6</sup> 包臘使用的是該書的英譯本，Domingo Navarrete,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 (London, 1704).

<sup>7</sup> 包臘並沒有直接引用衛匡國的《韃靼戰紀》，而是從龍思泰(Andrew Ljungstedt, 1759-1835)《早期澳門史》中轉引。至於《荷使初訪中國記》一書，包臘則使用英譯本，Johannes Nieuhof, *The Embassy of the Netherland East-India Company*, trans. John Ogilby (London, 1669).

時清朝的「文網」有所瞭解，因此在文中寫道：「在中國再次改朝換代之之前，有關滿人征服的檔案仍將無法查閱，中國官方史書中有關這段異族入侵的內容很可能一直缺失。」<sup>8</sup>但其實嘉慶以後文網已有所鬆弛，文字獄發生頻次大幅減少，收錄文秉(1609-1669)《列皇小識》、顧炎武(1613-1682)《聖安本紀》、王秀楚《揚州十日記》等十六種史籍的《明季稗史彙編》也於光緒十三年(1887)印行。<sup>9</sup>不過相關檔案的公佈的確要等到民國以後，尚可喜、耿繼茂《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和《平南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等深藏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文獻，直到 1920 年代學界才終得一見。<sup>10</sup>

包臘此文發表至今已經一個半世紀，專門研究廣州庚寅之劫的論文卻甚少出現，本人只找到兩篇：羅一星〈清初兩藩肆虐廣州考〉和林子雄〈清初兩藩攻佔廣州史實探微〉。<sup>11</sup>羅文主要利用《廣東通志》、《南海縣志》、《番禺縣志》、《廣州府志》等方志文獻，以及《李氏族譜》、《嶺南冼氏宗譜》等族譜文獻，敘述了耿、尚兩藩「血洗廣州城」和主政廣州期間的各種暴行惡政及其對廣州社會、經濟、民生等造成的嚴重危害，並認為「兩藩肆虐廣州這歷史上悲慘的一幕，已經在廣州人民心頭刻下了深深的傷痕，留下了痛苦的記憶」。<sup>12</sup>林

<sup>8</sup> E. C. Bowra,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anton," 86.

<sup>9</sup> 沈定平，〈明朝覆亡歷史與章太炎民族革命論〉，收入中國明史學會編，《明史研究》，第 14 輯(合肥：黃山書社，2014)，頁 284。

<sup>10</sup> 關於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流出、搶救、保存和最初的整理工作，參見羅振玉〈史序〉、王國維〈庫書樓記〉，見羅振玉輯，《史料叢刊初編》(收入于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第 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 129-135。

<sup>11</sup> 羅一星，〈清初兩藩肆虐廣州考〉，《廣州研究》，1984：1(廣州，1984)，頁 57-62。林子雄，〈清初兩藩攻佔廣州史實探微〉，《嶺南文史》，1996：3(廣州，1996)，頁 8-11。

<sup>12</sup> 羅一星，〈清初兩藩肆虐廣州考〉，頁 61。

子雄文主要利用《明季南略》、《清實錄》、《皇明四朝成仁錄》、《三藩紀事本末》、《清史列傳》、《尚氏宗譜》等明清史料，和《羊城古鈔》等地方文獻，分析了廣州城失守的原因，考證了清軍佔領廣州的時間，尤其是考察了廣州居民的死難人數，認為「城內居民死亡人數在四萬以下」，「藩兵入城後，兇殘無道，殺人不少，但準確地說，其並非『屠城』」。13不過，林文所據均非原始文獻，用南海、番禺二縣人口變化來計算廣州城的人口損失尤為不合邏輯。

至於非專論但提及庚寅之劫的著作，如蔡鴻生(1933-2021)在《清初嶺南佛門事略》一書中專列一章闡述平南王尚可喜與嶺南佛教之關係。他在徵引衛匡國、尼霍夫、王鳴雷、梁佩蘭(1629-1705)等人記述以呈現庚寅之劫慘況後，利用佛教文獻和嶺南詩文揭示了尚可喜佞佛的偽善。14在明清戰爭史、南明史的著作中，亦會涉及庚寅之劫，其中以顧誠(1934-2003)《南明史》和孫文良、李治亭《明清戰爭史略》為代表。顧著使用了尚可喜、耿繼茂《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平南王元功垂範》和王鳴雷《祭共塚文》等原始文獻以及衛匡國《韃靼戰紀》，敘述了清軍圍城、攻城、屠城的過程，並說「尚可喜、耿繼茂以漢族同胞的鮮血在清朝功勞簿上記下了『名垂青史』的一筆」，15展現了作者鮮明的立場。孫、李著中關於庚寅之劫的內容只有一段文字，16主要依據《尚氏宗譜》中所收錄的《元功垂範》，所持立場亦屬中性，但作者似過於信賴《尚氏宗譜》的記載。李治亭在〈《尚氏宗譜》與

13 林子雄，〈清初兩藩攻佔廣州史實探微〉，頁11。

14 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頁25-47。

15 顧誠，《南明史》，頁439。

16 孫文良、李治亭，《明清戰爭史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448-449。

三藩史實考辨》一文中雖承認「《尚譜》也貫徹了『為親者諱』的原則，所記難免隱惡揚善，未必事事皆真」，但在談及廣州屠城時，認為《尚譜》所記更為可信，即清軍只屠城「一天多」。<sup>17</sup>里斯本澳門科技文化中心研究員碧莎白(Isabel Murta Pina)在 2022 年發表〈曾德昭——17 世紀全球危機中兩個改朝換代的觀察者〉一文，主要是用曾德昭的報告和相關書信，闡述了作為見證者的曾德昭對 1640 年葡萄牙重獲獨立和 1644 年明朝滅亡的記載和看法，認為曾德昭認識到了 17 世紀中葉導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明王朝崩潰的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sup>18</sup>

從以上對原始文獻的簡介和研究史的簡要回顧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原始文獻還是後人的研究，大都蘊含著作者對歷史事件和人物所持的立場。本文會依據不同原始文獻考訂史實，但這並非本文的重點，而是將側重於分析三份原始文獻及其衍生文獻的敘述角度和立場問題，以及因立場的不同而產生的敘述偏差，並嘗試考察庚寅之劫在後世歷史記憶中的不同面貌。此外，本文也將透過分析曾德昭報告，呈現西文史料對研究中國歷史的價值。

## 二、征服者的立場：《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及尚氏對個人形象的塑造

1650 年 12 月 8 日(順治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即攻取廣州後的第 14 天，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子耿繼茂上《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題中稱

<sup>17</sup> 李治亭，〈《尚氏宗譜》與三藩史實考辨〉，收入《明清論叢》，第 1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頁 123、126。

<sup>18</sup> Isabel Murta Pina, "In the Eye(s) of the Storm(s): Álvaro Semedo, an Observer of Two Dynastic Transitions in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 *Ming Qing Yanjiu* 26 (2022): 172-193.

「恢克」，意指李成棟「叛變」後清軍「再次攻克」廣省；文中提及明軍將官時用「賊」、「偽」，表現征服者的立場。該《題本》在呈報奪取韶州、惠州等府情形後，著重敘述了圍困並攻破廣州城的經過，文云：

[二月]初陸日抵省。逆賊偽部院杜永和等負固抗拒，大砲冲打。<sup>19</sup>隨於城外紮營駐師，屢發書諭杜賊，回書語多不遜。初玖日五鼓時分發兵，暗擡梯子，取城北面。逆賊砲火矢石交加，我兵撤回。責令兩藩官兵，三面挖壕圍困。……

時方溽暑，兼之粵地卑濕，無日不雨，弓矢俱已解膠，道路遍皆泥濘，用兵維艱。且此城三面臨水，潮汐往來，潮退尚深丈餘。臣思非用大砲，斷難收功。乘間督令從化縣官季奕聲、牛录劉成德，鑄造大砲肆拾陸位，贛州帶來砲捌位，查取大砲壹拾玖位，其餘次號銃砲不開外，共計大砲柒拾叁位。臣營安爐鑄造鐵子，並四處設局製造火藥，兼行各處採買硝黃。每砲一位，備足火藥、炮子肆百出。攻城器具無不齊備，只待天氣寒涼、風高氣爽、道路乾涸舉發。但城頭砲火稠雜，城外周圍密佈炮臺，地形險惡，無隙可乘，何由下手？臣看得惟有西關一徑可圖進取，而西關亦復嚴防，造立木城，內用磚封垛口，與城無異；挑河三道，通連海水，兩傍盡是過膝陷泥。值奉調贛兵及廣德鎮兵前後繼至，始於拾月貳拾玖日指授方略，分發兩藩各鎮總兵官連得成、班志富、郭虎、高進庫等各官兵，棄馬徒步，涉泥而前，奮勇冒險，砍開木城，攀援內城垛口而上，遂克西關。又遣副將曹仁先、牛录陳世重，統領馬甲，接踵應援而入，隨即運大砲，於初壹日

<sup>19</sup> 本文所使用文獻中往往「炮」、「砲」、「礮」混用，本文在引用時，均依照原文用字，而正文中統一用「炮」字。其他異體字亦按此原則處理，不另註明。



三鼓，排列放炮攻打。于初貳日未時，打倒城西北角叁拾丈。城上炮火矢石依然交加，我兵爬城，復被打退。臣見事勢危急，同靖南王子耿繼茂親冒矢石，不避炮火，先抵城根。各鎮將領始相奮勇，冲爬而上，殺死逆賊官兵陸千有餘，追至南門海邊，渾死無算。活擒總兵范承恩，暫養用示招撫。偽部院杜永和、偽伯張月、李四、李五、水師偽總兵吳文獻、殷志榮等，俱由水路逃去，大小船隻千餘，一時奔竄出海。其餘偽總兵、將領死于亂軍中者，尚未一一查明。沿城得賊大砲伍百壹拾貳位，賊馬柒百貳拾叁匹，盔甲、器械、烏鎗、各樣火器不可勝計。得偽周世子印壹顆，偽伯銀印貳顆，偽銅印關防肆拾壹顆。全城已經恢克，臣于初叁日率領文武大小官員進城，安插遺黎。其攻城傷亡官兵及奮勇取關上城功次，俱經給賞，候事平，並投誠文武將吏及各府逐月塘報造冊，另疏彙敘。<sup>20</sup>

該《題本》是尚可喜、耿繼茂上呈順治皇帝(1643-1661 在位)和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的戰報。在所有與清軍圍困、攻陷廣州相關的現存文獻中，該《題本》的寫作時間距離事件發生時間最為接近(不足半個月)，所發生之事尚不足以因記憶不清而記述錯漏。因此這份由當事者當時撰寫的文獻，是目前已知最為原始的文獻，且所記內容最為詳實。《題本》中諸如清軍抵達廣州、開始圍困、開始攻城、城破及兩藩入城的時間；挖濠、鑄炮、造炮子火藥、調遣援軍、招撫紅旗水師等攻城準備工作；攻城過程及參與將官、殲滅明軍官兵人數、俘獲及逃走明軍將官姓名、所獲戰利品等資訊多可採信。

但《題本》是以征服者的視角和立場記述的，從中我們只能瞭解

<sup>20</sup>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第 12 冊(臺北：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86)，A12-59(6-2)至 A12-59(6-5)。該題本之鉛字本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丙編第 8 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769-770。

到有限的關於守城方的資訊，如拒降、建木城加強防禦、擊退清軍最初的強攻、兩廣總督杜永和帶張月等人逃走等，但看不到明軍守城方略、備戰措施、供給保障、對外聯絡等方面的詳細情況。更有甚者，《題本》中涉及城中百姓的只有「安插遺黎」四字，完全不記百姓遭遇，也未提及是否「屠城」。也就是說，尚可喜、耿繼茂該《題本》對所彙報內容是有選擇性的，即便我們相信其所報內容基本屬實，也要知道其片面性。原始文獻的作者往往會有自己的鮮明立場和主觀視角，關於戰爭、暴力、擴張、征服等激烈衝突的歷史文獻尤其如此。因此，想要瞭解事件全貌，後世的研究者要盡可能綜合參考衝突諸方的原始記錄。

攻克廣州、征服整個廣東是尚可喜戎馬一生中的最重要軍功之一，在此後的個人形象塑造中，這一功勳都是重點渲染的內容。攻佔廣州一年半後，尚可喜便在圍城期間清軍營地上建東、西得勝廟二座，奉祀戰神關公，將攻取廣州歸因於神助。同治《南海縣志》卷十二收錄了尚可喜撰〈新建東西得勝廟碑〉，文云：

今上七祀庚寅暢月二日，始恢復粵省。武奮文揆，兆民憬化。暨三稔，乃建得勝廟于舊營白雲山之麓，以崇祀關帝，志不忘宣佑也。……杜、李逆黨，乘間飭備，擁眾負隅，議者謂非急攻不可。予省其城東南濱海，繚以重垣，可圖者惟西北二向耳。彼有備而我驟取之，未必可勝，先喪已成，良不忍以生命試也。彼之患我者弓矢，所自為恃者火礮。我無若掩其所患，而即用其所恃。會從化令季奕聲習火攻之具，因為鳩工，更製徵辦火藥，凡既備矣。審勞久之必懈，窺守曠之必疏。密移礮具，併力西關。予同靖藩躬抵城下，不避矢石。我師登陴立幟，而逆眾不知，動天潛地，疑鬼疑神，則又帝之大有造於我師也。因惟予與靖藩，自北而南，常默有契於帝，令者眷屬無恙，猶云私德而幸，茲列郡販

誠，民安物阜，以叨承乎爵土之榮，其敢忘冥佑哉！爰新廟宇，祇薦春秋。於是文武群工額手而頌曰：「天寵榮哉！國福基哉！王公伊濯，士用命哉！神庥洊至，勒貞璫旌，不朽哉！」

順治九年梟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拜颺。<sup>21</sup>

觀此碑文，古雅且多用典故，當非出自尚可喜之手，而是假託他人之筆。文中雖多次感激關帝護佑，實際上是為了展現兩藩的英明、勇敢與仁慈，而「民物阜安」絕非實情，「天寵榮」「國福基」亦為諂媚之詞，意在凸顯王者之師的正當性和兩藩征服廣東的豐功偉業，因此此兩廟的修建無疑為兩藩塑造個人形象之舉。該碑高一丈、寬三尺，碑陰刻有征粵諸將自總兵許爾顯、班志富、徐成功、連得成以下藩屬共二百有二人，本可作為重要文獻，可惜至清末這些名字已多剝蝕不可辨，而方志亦未錄。

東、西得勝廟殿左各懸一口大鐘，東得勝廟鐘為尚可喜於順治九年(1652)三月捐造，西得勝廟鐘為耿繼茂於順治十年三月捐造。二鐘今或已不存，但其銘文被收錄於同治《南海縣志》卷十二：

東得勝廟鐘款(楷書)

今上龍飛之七年二月初六，師抵五羊城北白雲山，結營山阿，凡九閱月。將士奮騰，兵馬無恙。其間鑄礮製藥，隨手而應，陰有神助。是年十一月初二恢省。追溯不忘，乃捐貲建造得勝廟，內塑關帝神像。爰勒之鐘鼎，以志神庥於不朽，仍鐫以銘。

<sup>21</sup> 梁紹獻等纂，同治《南海縣志》(收入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第35輯史部方志類第37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9，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一年[1872]羊城內學院前翰元樓刻本影印)，卷12，〈新建東西得勝廟碑〉，頁1a-2a。此碑文亦收錄於丁仁長、吳道鎔等纂，宣統《番禺縣續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7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據民國20年[1931]重印本影印)，卷36，頁2a-3a。但文字略有不同。

銘曰：鳴鏜肅旅，以事南征。緣巖列帳，依岫分營。百舉彙應，乃克堅城。爰溯神力，鑄鐘勒銘，用以永播其芳聲！

順治壬辰歲三月吉旦，平南王建。

廣州府督捕通判周憲章監造。

西得勝廟鐘款(楷書)

今上龍飛七年二月六日，兩藩師次廣州府城北，遶山為營，凡九閱月，城始克。中間曠日持久，克敵制勝，若有神助。祀典宜光，爰度營盤舊址，誅茅結宇，奉關帝神像而祀之，志不忘也。既勒碑以紀其盛，仍系銘於鐘。

銘曰：鐘以立號，古樂用彰。神之聽之，其音洋洋。月沉霜落，覺悟萬方。大成既集，媲美素王。惟帝之聲，山高水長。

順治十年歲在昭陽季春月吉旦鑄。欽命靖南王捐造，藩下牛录章京沙祖泰督工。<sup>22</sup>

銘文雖簡，但內容結構和用意與得勝廟碑銘同，敘述攻克廣州的過程，把此功勳視為神助，讚美關公的同時，讓自己的功績廣播。同年，兩藩又在得勝廟後方捐建太平庵(又名白雲庵)。該庵建築今不存，亦不知其是否有碑銘，尚可喜為其捐造的鐵鐘卻於 1982 年在太平庵遺址被發現，現藏於廣州博物館，銘文曰：

今上龍飛之七年，平南王奉命恢粵。二月初六，師抵五羊城北白雲山，結營山阿，凡九閱月，將士奮騰，兵馬無恙。其間鑄炮製藥，隨手而應，陰有神助，是年十一月初二日恢省。追溯不忘，乃捐貲建造太平庵，內塑佛像。爰勒之鐘鼎，以志佛力於不朽，

<sup>22</sup> 梁紹獻等纂，同治《南海縣志》，卷 12，〈金石略二〉，頁 2a-3a。〈東得勝廟鐘款〉亦收錄於廣州市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主編，黃兆輝、朱廣編撰，《駐粵八旗史料彙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頁 5-6。

仍鑄以銘。銘曰：鳴鐸肅旅，以事南征。緣巖列帳，依岫分營。

百舉彙應，乃克堅城。爰溯佛力鑄鐘銘，用以永播其芳聲！

順治壬辰歲三月吉日，平南王建。廣州府督捕通判周憲章監造。<sup>23</sup>

此鐘銘與東得勝廟鐘銘大體一致，只是將關帝改為佛，則其取得的軍功到底是關帝還是佛祖保佑的？可見在尚可喜看來，只要能將其征服嶺表的戰績神化，借神力以揚己名，關帝也好，佛祖也罷，並無所謂。捐建太平庵開啟了尚可喜此後一系列佞佛舉動的序幕，但正如蔡鴻生先生以及年輕學者王萌筱分析，尚可喜在嶺南的大量佞佛活動暨有取悅清室、收拾民心的政治考量，也是洗去血腥過往、操控歷史記憶的一種策略。<sup>24</sup>而尚可喜對個人形象的塑造不僅限於建廟、勒銘、佞佛方面，還體現在其主導編撰年譜和家譜上。

順治九年(1652，即捐建得勝廟的同一年)五月，尚可喜創修《三韓尚氏宗譜》，<sup>25</sup>兩廣總督李棲鳳(1594-1664)序，署時間為「順治壬辰年蒲月吉旦」(即順治九年五月初一日)，但李棲鳳於順治十五年(1658)才任兩廣總督，其所署職銜當為後補。這部宗譜雖未被認為是《尚氏宗譜》的一修譜，

<sup>23</sup> 廣州市文物志編委會編，《廣州市文物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0)，頁277。該鐘銘被錄入史澄、何若瑤總纂，同治《番禺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6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據清同治十年刻本影印)，卷24，頁23a；史澄、李光廷纂，光緒《廣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據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影印)，卷88，頁17-18。方志中「爰溯佛力鑄鐘銘」寫為「爰溯佛力，口勒鐘銘」。

<sup>24</sup> 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頁39；王萌筱，〈權力的場域：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在廣東的寺廟建設及其權力運作〉，《勵耘學刊(文學卷)》，2014：1(北京，2014)，頁156-157。

<sup>25</sup> 遼寧省圖書館特藏部藏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編號：遼圖31842。參見：<http://shang2.zupu.cn/wenhua/337046.jhtml>，擷取日期：2024年11月10日。

但卻為此後所修《尚氏宗譜》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是尚可喜年譜《元功垂範》的主要依據。<sup>26</sup>

尚可喜晚年對修年譜和家譜之事更為重視，意欲為自己的戎馬一生定位，並以之垂範子孫。修年譜一事曾委託給尹源進(1628-1686)，但尹氏進展不順。1673年，釋今釋(1614-1680)赴廣州，尚可喜出示「宿昔家乘所錄者」，請他完成此事。今釋僅用時一個月，便修纂完成《平南王元功垂範》一卷。<sup>27</sup>所謂「家乘」，應該包括《三韓尚氏宗譜》在內。今釋撰定的這部年譜體傳記敘述了尚可喜自天啟四年(1624)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間事蹟，其中涉及其率軍攻克廣州城的部分甚為詳細。文曰：

[十月]二十九日，王指授方略，以西關迤北一隅可架砲進取，分發兩藩各鎮總兵班志富、連得成、郭虎、高進庫等，率兵棄馬，徒步涉淖泥而前，奮勇砍開西關外濠木柵，自長橋南趨新築小城，從垛口騰上，遂克西關。

十一月朔二日克廣州

先一日三鼓，列砲攻城。日午，西門北面城崩三十餘丈。時城身猶余丈許，攻者爭上城上，砲火矢石如雨，死傷頗多。王聞之，怒，披甲上馬，親往督攻。群下進諫，謂：「王宜持重，勿蹈危地。」何景貴曰：「事急矣！城不能取，砲且俱失，王不躬臨，誰肯用命耶？」景貴即從王先行。王至砲所，麾將士更發疊擊，聲如震雷，砲子如驟雨，煙焰如黑風毒霧，諸將士面如潑靛，如

26 王小夢，〈海城尚氏宗譜文化探析〉，《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4：1(齊齊哈爾，2014)，頁101。

27 尹源進，〈序〉，收入釋今釋撰定，尹源進、李棲鳳校訂，《平南王元功垂範》(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6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據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影印)，頁84。

黔突，皆無人色。而王意氣益壯，城身漸平，麾諸攻城者上。諸將以前隊死傷，別行選撥。王叱之曰：「天將暮方撥兵，安用爾曹為？」王震怒一呼，吏士失魄，越濠爭進。前者方上，後者忽墮；後者甫上，前者復墮。王脫鐵甲，被綿甲，索馬過濠。群下又諫，王曰：「吾得此城，猶能容爾等；不得此城，吾無面目見朝廷，爾等復何面見吾？」孫得才獨進曰：「城之得失，在此一刻，王當過濠。」遂挺身從王馬渡水。水及馬腹。王登岸，即提刀督押，士無敢退步者。時城上砲火密若張羅，不容一隙。王棄所乘馬，躬欲先登。群下抱王足泣諫。王曰：「爾等親見士卒不能登城，吾欲先登，爾等復不許，吾當死此。」即舉刀自刎。群下奪刀。於是諸將士忘身效死，從肩背頂腦上，踐踏飛行，爭先直進，遂登其城。分兩翼射之，矢如飛蝗，守兵大敗，斬首六千餘。追至南門，逼海墻，溺死尤眾。杜永和及其將張月、李建捷、吳文獻、殷之榮等以舟數百艘，奔躡出海。生擒城守總兵范承恩，餘將領死亂軍中不可勝計。獲周世子印一顆，侯印三顆，銅印關防四十一顆；大砲五百十二位，馬七百二十三匹，盔甲、器械、鳥槍無算。初三日，王與靖南王子入城，止屠戮，封府庫，收版籍，亟遣人至郡學，守視祭器，毋令散佚。傳檄郡邑，安處將吏卒伍。居數日，所屬州縣相繼來歸。遣官建廟於屯軍之山，額曰得勝，奉漢壽亭侯，以旌武功。<sup>28</sup>

此段敘述比《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要詳細得多，描繪了攻城過程中的很多細節。此文成於攻克廣州 23 年之後，所述反而更詳，儘管尚氏提供「家乘」作修撰時的參考，其中細節仍有杜撰之嫌。更何況其對攻城過程的描繪過於戲劇化：城破而難登之時，尚可喜欲親往督攻，

<sup>28</sup> 釋今釋撰定，尹源進、李棲鳳校訂，《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頁 157-160。

群下諫持重，而何景貴力排眾議隨王先行；登城受阻、傷亡慘重、眾將士氣低落之際，「王震怒一呼」，官兵便爭相越濠進攻；官兵過濠紛紛跌落之時，尚可喜脫掉鎧甲索馬欲親自過濠，群下又諫，唯獨孫得才認為「王當過濠」，並隨尚可喜縱馬涉水；尚可喜登岸後「提刀督押」，官兵不敢後退；當城上炮火更猛烈之時，尚可喜欲身先士卒，棄馬先登，這一次群下抱住尚可喜的腳阻止，而尚可喜以自刎相威脅，將士們見此情景，「忘身效死」，遂登其城。整段描述畫面感甚強，尚可喜的英勇形象躍然紙上。撰寫《元功垂範》的目的正如書名所示，乃為垂範後世子孫。有鑑於此，我們更有理由相信，此類富有文學性的描述未必為歷史實情的再現。至於次日兩藩入城「封府庫，收版籍，亟遣人至郡學，守視祭器」之類，乃為凸顯征服者重視對文化、教育的保護，亦因無其他文獻佐證而真偽難定；而從其他原始文獻可知，「止屠戮」一項為徹頭徹尾的謊言。

《平南王元功垂範》編撰者釋今釋，俗名金堡，字衛公，又字道隱，為永曆朝抗清忠臣，因所謂「五虎案」而遭迫害，<sup>29</sup>心灰意冷，落髮為僧，師從天然禪師(1608-1685)，法號今釋，字澹歸，於丹霞山建寺弘法。<sup>30</sup>作為逃禪的明遺民，其氣節曾受到錢謙益(1582-1664)的表彰，但與尚藩的這段交往，則使他為其他遺民所不齒。王夫之(1619-1692)曾將方以智(1611-1671)和今釋作比較，讚揚方以智氣節，而對今釋取悅尚藩甚為鄙視，曰：「道隱則以崇土木、飯髡徒之故，不擇人而屈下之，

29 王夫之，《永曆實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點校本)，卷21，〈金堡傳〉，頁198-206。

30 陳世英等纂，《丹霞山志》(收入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07-108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據清康熙年間稿本影印)，卷3，〈澹歸禪師傳〉，頁163-176。



與尚氏往還，稱頌之不作。」<sup>31</sup>後來全祖望(1705-1755)作〈肇慶訪故宮〉詩一首，諷刺今釋與尚藩的關係，詩曰：「辛苦何來笑澹翁，《徧行堂集》玷宗風；丹霞精舍成年譜，又在平南珠履中。」<sup>32</sup>所謂「成年譜」，即指今釋根據尚氏「家乘」撰定的《元功垂範》。今釋在《元功垂範》中用「論曰」的形式對尚可喜的每項事蹟加以評論，當中對尚可喜攻克廣州城一事主要稱讚其用兵知急緩和臨危時身先士卒。<sup>33</sup>針對尚可喜「家乘」中稱明「為偽、為賊」，今釋認為不妥，遂上書平南王曰「恐非正理，……蓋天下之分義，當與天下共惜之，天子之體統，當為天子共存之也。王此書雖為家乘，而事關國史，當傳之天下，後世不敢草草，」<sup>34</sup>因此盡行修改。但此舉不能視為澹歸站在明朝的立場上立論，而是從「理體」，即儒家道德的角度考慮，仍是為保持平南王的正面形象。

《平南王元功垂範》成書兩年後(康熙十四年，1675)，《尚氏宗譜》修成，尚可喜親撰《修譜序》。雍正時期任佐領的尚可喜之孫尚崇壁呈造《平南親王尚可喜實跡》一冊，<sup>35</sup>其中涉及攻取廣州的部分，與

31 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2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點校本)，〈搔首問〉，頁631。

32 全祖望，《結埼亭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抄本影印)，卷10，〈肇慶訪故宮〉，頁425。

33 釋今釋撰定，尹源進、李棲鳳校訂，《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頁160-163。

34 釋今釋，《徧行堂集》(收入陳建華主編，《廣州大典》，第56輯集部別集類第17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9，據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卷24，〈上平南尚王〉，頁2b-3a。

35 該《實跡》冊在內閣大庫中有保存，後被羅振玉發現並校錄，以《平南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之名刊於民國十三年(1924)由東方學會出版的《史料叢刊》中，影印本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68冊，頁357-420。尚崇壁傳略則見尚久蘊、尚世讓、尚文化主修，《尚氏宗譜(1675-

《元功垂範》大略相同。尚氏後人呈造《實跡》冊的舉動，無疑是為了趁向清朝國史館提供資料之便，讓家族內傳承的尚可喜形象獲得朝廷認可。而《實跡》冊後又被收入乾隆五十六年四修的《尚氏宗譜》，<sup>36</sup>進一步在家族內部鞏固有關尚可喜的記憶。1939年五修《尚氏宗譜》時，《元功垂範》始被收入其中。<sup>37</sup>

1676年(康熙十五年)尚可喜去世，次年康熙帝(1661-1722 在位)賜諡「敬」。1680年(康熙十九年)其靈柩歸葬遼東海城，次年康熙帝賜守墓閒散佐領兩員、御碑一通。在梁清標(1620-1691)所撰的《皇清冊封平南敬親王尚公墓誌銘》中，涉及攻取廣州的部分這樣寫道：

廣州未下，城主杜永和以死守。王按甲造戰艦、鑄炮，既成，百道並進，炮發煙火若黑霧，城上益矢石雨注，不得近。王怒，脫鐵甲，披綿甲，躍馬渡濠，督將士，持刀欲先登，左右泣抱。王呼曰：「城不破我何報天子？」拔刀自刎，群下持之，將士咸肉搏上。既克，即下令禁屠掠、封府庫、收版籍、護郡學，粵民至今服王之勇且仁也。王為人機警沉深，決謀策若深山大林，龍虎變幻不測；遇敵彪悍猛厲，莫能抗拒。然性善慈愛，與人寬和，將兵不妄掠婦女，好文禮士。廣州平三月，輒名博士弟子，集講堂，陳琴瑟鐘鼓，稱說詩書，日旰乃退。<sup>38</sup>

「既克，即下令禁屠掠」顯然是為尚可喜掩蓋屠城事實，清軍的屠城惡行是耿繼茂和尚可喜都曾承認的。據《八旗通志》記載，「繼茂與

---

1994)》(第六次續修，遼寧省新聞出版局批准出版，1994)，頁918。

<sup>36</sup> 細谷良夫，〈《平南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の原本について〉，《滿族史研究通信》，7(東京，1998)，頁1-16。

<sup>37</sup> 王小夢，〈海城尚氏宗譜文化探析〉，頁101。

<sup>38</sup> 尚久蘊、尚世讓、尚文化主修，《尚氏宗譜(1675-1994)》(第六次續修)，頁147。

可喜攻下廣州，怒其民久相抗，凡丁壯輒誅戮。」入城後，兩藩在城中駐兵、牧馬、大興土木，遭即將上任的廣東布政使胡章疏劾，控其「縱兵不戢」，耿繼茂、尚可喜上奏辯解稱：「前者我兵圍廣州九月，被賊礮擊鋒傷，不知凡幾。城下之日，即食肉寢皮未足洩憤」。<sup>39</sup>《廣州府志》亦收錄《八旗通志》中的這段記述。<sup>40</sup>至於《墓誌銘》中「粵民至今服王之勇且仁也」、「兵將不妄掠婦女，好文禮士」云云，通過持南明和廣州人民立場的文獻可知，不過是自說自話而已。

### 三、廣州人民的立場：王鳴雷《祭共塚文》

尚可喜、耿繼茂的《題本》完全站在征服者的立場上向清廷彙報「恢克廣省」的戰功，《東得勝廟碑記》、《得勝廟鐘銘》、《太平庵鐘銘》、《元功垂范》、《尚氏宗譜》、《實跡》冊等一系列文獻展現的則是尚氏個人立場、凸顯其豐功偉績。堅守廣州城九個月的南明官兵在此系列文獻中只是配角，缺乏相關資訊。

事實上，在南明一方(包括明遺民和永曆官方)的文獻記錄中，有關廣州城陷的記載更少，且亦常有不實之處。戰敗者或被征服者的記錄往往不多，這一方面因為他們在被進攻、追擊、屠殺、鎮壓的過程中難以有機會與心境記錄此類失敗的遭遇；另一方面戰敗者、被征服者即使有一些記錄，其聲音也往往遭到戰勝者、征服者的打壓，使得相關文

<sup>39</sup> 福隆安等續纂，《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94，〈人物志七十四·耿繼茂〉，頁26。此處所引「凡丁壯輒誅戮」等文字，不見於乾隆七年(1742)完成的漢文本《八旗通志初集》，此或與滿文本之漢譯有關，但具體原因以及這一變化背後是否存在政治考量，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sup>40</sup> 史澄、李光廷纂，光緒《廣州府志》，卷80，〈前事略〉6，頁18。

獻遭禁毀，密藏此類文獻者亦不敢輕易公開傳播。這直接導致了現存南明一方關於廣州城陷落的記載甚少且甚簡，例如王夫之《永曆實錄》(1673)中只有「清兵陷廣州，杜永和走入海」寥寥十餘字。<sup>41</sup>曾任永曆朝御史的魯可藻在其所著《嶺表紀年》中記庚寅廣州城陷事，<sup>42</sup>云：

十一月，□平南、靖南攻陷廣城

先張月等大敗之，砲傷無數，鐵甲燒紅，扯不能脫，扛大板鑽透其板，猶連傷數人。兩□王對坐，彈碎其案，驚怖欲死。其晚更餘，集各將士誓死一攻西門，遂移兵而西，打壞西城數丈。城上大砲一打，成路傷人以千計，膽落而遁。隨又修整壞處，遂下城就飯。□乘空而登，城中遂潰。杜永和、張月、張道瀛、李建標、吳文獻、殷之榮登舟入海，楊有光登舟不及，沒于水。永和是自放砲貫藥，手臉俱黑，不似人形，登舟時惟頓足歎嗟，低回不服。其門役趣之曰：「奴才便如何急喚范總兵守西門！」乃范承恩也。承恩先有二十人逃入□營，未幾數人還，永和已疑之。是夜突陷從不相犯之西門，承恩遂從水中投□舟請降，入其營，優待之，惟不假以兵事。<sup>43</sup>

魯可藻生卒年不詳，《嶺表紀年》亦不知成書於何年，其所記內容自隆武二年(1646)十月至永曆五年(1651)正月，則該書或成書於1650年代。這段記載從明朝的視角和立場上，讓我們對明軍守城過程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兩藩「驚怖欲死」的敘述更與《元功垂範》塑造的尚可喜勇

<sup>41</sup> 王夫之，《永曆實錄》，頁17。

<sup>42</sup> 關於《嶺表紀年》的作者，學界尚有爭議，浙江古籍出版社於1984年整理該書浙江圖書館藏抄本時，認為作者為魯可藻(見〈前言〉，頁1)，本文從之。

<sup>43</sup> 魯可藻，《嶺表紀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據浙江圖書館藏傳以禮校本點校)，卷4，頁142。「□」為原抄本中被挖字，據文意當為「虜」「賊」「偽」等字。

猛形象形成鮮明的反差。西城牆被清軍轟開數丈後，明軍仍用炮死守並修整城牆，但清軍趁明軍下城吃飯的機會攻上城牆、進入城中。這一細節不見於其他文獻。在目前已知文獻中，關於明軍將官乘船撤離的記載，也以這段文字記錄的人名最多，且記錄了杜永上和船後低落、不服的情緒。杜永和作為明朝兩廣總督，守城時親自放炮、裝填火藥，弄得「手臉俱黑、不似人形」，此一細節的描寫雖呈現了杜永和的狼狽，卻也凸顯其守城之勇。文中魯可藻可能還暗示范承恩通敵，但也有可能只是為杜永和未能守住廣州城找個藉口，因尚、耿在《題本》中明確說是活捉范承恩。范承恩通敵之說在此後的文獻中又有新的演繹，計六奇(1622-約1687)《明季南略》(1670)卷十三有「羊城崩陷」一條云：

[永曆四年]十月初十日庚寅，永曆聖誕。杜允和會齊文武官于五層樓拜祝，時有守西外城主將范承恩亦在焉。承恩本淮安府皂役，從成棟入廣者，目不識丁，故綽號「草包」。時允和直呼之，承恩謂辱之於眾也，恨甚，遂潛通平南、靖南二王。十月二十八日戊申，清兵竟攻西外城，承恩退入裡城，而外城失矣。連攻三日，十一月初二日辛亥未刻，羊城崩陷，允和仍率三司官屬，攜兩廣總督印，航海而去。後二年，俱歸順，南海悉平。<sup>44</sup>

計六奇此說在後世影響較大，徐鼎(1810-1862)《小腆紀年附考》、<sup>45</sup>仇巨川《羊城古鈔》、《清史稿》等書均採此說。與《嶺表紀年》一樣，《明季南略》亦從守城官兵的角度敘述，但均不提城陷後清軍屠城情況。戴笠(1614-1682)《行在陽秋》的記載則側重明朝軍民守城之英勇和城內百姓遭遇之悲慘：

44 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據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清初舊抄足本、常熟曹氏藏本點校)，頁427。

45 徐鼎，《小腆紀年附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咸豐十一年[1861]原刊本點校)，卷17，頁650。

[永曆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清陷廣州，屠之。李元胤攜重資入廣州；城中人亦嬰城自守。男子上城，婦女饋餉。清兵環圍城外，自八月至十一月初二日五鼓，北門觀音山紮雲梯，遂入城。城中驚惶相蹂踐，炮銃相擊，城門築塞難開，百萬人民，盡死於內。杜永和自清遠敗後，退還端州，尚有兵萬人。知不能守，遂奔恩、平、高、電以扼高、雷、廉。<sup>46</sup>

但「百萬人民，盡死於內」顯非源自實際死亡人數的統計。王夫之、魯可藻、計六奇和戴笠均未親歷庚寅之劫，所記內容或源於聽聞，或來自其他書籍，較之《題本》，不能算作最原始的文獻，以此類文獻研究庚寅之劫需謹慎。

廣州城陷後，時年僅 20 歲的屈大均(1630-1696)在番禺落髮為僧，師從天然和尚，法號今種，名所居為「死庵」。1650 年，屈大均作〈猛虎行〉詩，痛斥清軍屠城暴行，罵滿洲征服者為化作猛虎的畜生(「邊地不生人，所生盡奇畜。……變化成猛虎，食盡中土肉」)，捕食猶如甘甜小黃牛的嶺南人(「廣南人最甘，肥者如黃犢。猛虎縱橫行，饜飫亦逐逐」)，造成「人類日已盡，野無寡婦哭」的慘境。<sup>47</sup>庚寅之劫給屈大均留下了一生的痛苦記憶，1690 年(康熙二十九年)初冬，已入晚年的屈大均攜諸子至廣州北郊尚氏墓堂，作〈感懷往事〉長詩，既有對清軍攻城過程的回顧(「衝梯朝鼓舞，笳吹暮宣豳。噴藥飛天炮，穿沙震地雷。……要壘西關賣，堅圍北面捶」)，也有對尚、耿二藩的怒斥(「六角先戎首，三藩即禍胎。……豚犬生何益，貪狼死不回」)，並借古樂輓歌〈蒿里〉曲，祭奠劫難中被害百姓的亡靈(「長歌蒿里曲，

46 戴笠，《行在陽秋》(收入《明代野史叢書》之《三朝野記(外四種)》，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卷上，頁 287。

47 屈大均撰，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卷 1，〈猛虎行〉，頁 6。

每奠國殤杯」)。<sup>48</sup>屈大均另著有《皇明四朝成仁錄》，為崇禎、弘光、隆武、永曆四朝抗清就義烈士作傳，其中「後廣州死事諸臣傳」即記庚寅之劫中死難的南明官員馮耀、郭瑤、施輝然等人之傳，為我們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南明將官守城表現記錄，其中〈郭瑤傳〉云：

郭瑤，字季文，南海人。……[李成棟]反正後，走行在所，上書，授遊擊將軍，為某總兵旗鼓。永曆四年春，廣州被圍，瑤與勳爵杜永和等戮力死守。城陷，冠帶坐中庭，酌酒以待兵入，奮罵見殺。瑤故人崔應龍者，燕人也，時為廣中都司，城陷，入文廟謁辭孔子，縊而死。有馬承祖者，廣州右衛達官指揮，守五羊門，城陷，與子宗保、宗仁同戰死。<sup>49</sup>

〈施輝然傳〉云：

施輝然，番禺人。……歷官副將，為太子太師王化淳軍前昭勇將軍。永曆四年，廣州被圍，分守西城十閱月。城陷，巷戰而死，家中男婦十餘從之。子祚基五歲，以哭父亦死；從子廷基，以城陷被俘不屈死；其從兄煒然、從弟煥然，永曆初同為護駕將軍，後為益陽王軍前副將，皆以殉難死。<sup>50</sup>

庚寅之劫中，南明守城官兵殉難者肯定不止此數位，遺憾的是其名多不傳。屈大均為此數人作傳，為我們留下了難得一見的廣州守城抗清者個人事蹟。《皇明四朝成仁錄》在清代兩遭禁毀，僅以抄本行世，至民國三十六年(1947)才由葉恭綽(1881-1968)耗時五年校訂出版。

<sup>48</sup> 屈大均撰，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第4冊，卷10，〈感懷往事〉，頁1404-1405。

<sup>49</sup> 屈大均撰，《皇明四朝成仁錄》(收入《廣東叢書》，第2集，香港：商務印書館，1947，葉恭綽輯錄、整理、校勘本)，卷11，〈郭瑤傳〉，頁399b-400a。

<sup>50</sup>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卷11，〈施輝然傳〉，頁400a-400b。

從廣州人民立場記錄此次浩劫且流傳較廣的原始文獻，則為王鳴雷〈祭共塚文〉，其全文如下：

庚寅，平、靖二藩再破廣州，屠戮甚慘，居民幾無噍類。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燬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因築大坎瘞焉，表曰「共塚」。鳴雷為文祭之，云：

嗚呼！一治一亂，維天有道。一死一生，維人有數。在昔尉陀，<sup>51</sup>南土翼翼。迄于盧循，<sup>52</sup>降割邦域。殺人盈城，屍填溝洫。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饑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骷髏。或如寶塔，或如山丘。便房已朽，項門未枯。欲奪其妻，先殺其夫。男多於女，野火模糊。羸老就戮，少者為奴。老多於少，野火輓轡。五行共盡，無智無愚。無賤無貴，同為一區。豈無同姓，鬼食嫌疑。生妻在傍，冥漠未知。兒尚繼祿，母已生離。骨無人收，兒在背饑。亦有弱婦，倉卒入房。暮昏晨別，未拜姑嫜。斷肌委塵，粉骨埋香。生不相見，良友巾幘。如何墓門，不遠咫尺。嗟乎，悲哉！浩浩黃雲，瀟瀟暮雨。誰斂魂魄，而聚比戶。野狐鄰穴，野葵塞路。崢嶸荒墟，白楊蓑衣。大小號呼，同歸鄉土。回首西天，勿生劫道。江南庾信，傷心作賦。因而大招，夫寧無禱。乃招曰：

<sup>51</sup> 尉陀(?-137BCE)，真定(今石家莊市東古城)人。公元前 218 年，奉秦始皇命令征嶺南，略定南越後，任為南海郡(治所在今廣州市)龍川(今廣東龍川縣)令，後為南海尉，建南越國，稱南越王。

<sup>52</sup> 晉元興三年(404)九月，盧循攻打廣州南海郡的治所番禺(今廣東省廣州市)，廣州刺史吳隱之率軍固守抵抗。十月，盧循夜襲攻陷番禺，抓獲吳隱之，將城中府舍、民居焚燒殆盡。



欲開兮天門，燕城荒兮隴樹寒。有年月兮無瓦棺，誰之哀兮露漫漫。往復兮新墳未乾，狹茲窀穸兮相安。<sup>53</sup>

此祭文為後人提供了當時廣州居民遭遇劫難的群體意象。同治《番禺縣志》載王鳴雷字震生，番禺人，並稱：

鳴雷聰慧，早知名。隆武乙酉鄉試，鳴雷兼五經，考官驚其才，欲首舉之，以格於例，置榜末。廣州擁立，授中書舍人。大清兵克廣州，與羅賓王俱下獄。既得釋，乃逾嶺北，游燕趙，往來吳楚。歸而自題所居曰「窮室」，為《醉鄉侯傳》以寄意。時秀水朱彝尊、新城王士正至領表，俱重之。嘗學于梁朝鐘，為文有師法，奇古奧勁，似戰國諸子。康熙初，與修《廣東通志》，時稱典核。著有《王中秘文集》《空雪樓詩集》。<sup>54</sup>

則廣州城破之時，王鳴雷似在城中，且被捕入獄。他目睹了清軍屠城之暴行，勾起其對秦朝和東晉南征時屠戮嶺南的歷史記憶；面對皚皚白骨，他以「奇古奧勁」的筆觸寫下這篇祭文，既有對清軍暴行的記述和控訴，也有對遇難同胞的哀悼。這是一篇罕見從廣州人民的角度記述庚寅之劫的原始文獻，其價值堪比王秀楚《揚州十日記》和朱子素《嘉定屠城紀略》，十分珍貴。王鳴雷撰成此文後，「遠近傳誦」，<sup>55</sup>「頗行於世」。<sup>56</sup>

53 九龍真逸(陳伯陶, 1854-1930)撰, 謝創志整理, 《勝朝粵東遺民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卷1, 〈王鳴雷傳〉, 頁72-73。

54 史澄、何若璠總纂, 同治《番禺縣志》, 卷42, 〈列傳十一〉, 頁530。與王鳴雷一同入獄的羅賓王, 以及王鳴雷師梁朝鐘, 該志中俱有傳, 見頁528、525。

55 九龍真逸(陳伯陶)撰, 謝創志整理, 《勝朝粵東遺民錄》, 卷1, 〈王鳴雷傳〉, 頁73。

56 鈕琇, 《觚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第1177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臨野堂刻本影印), 卷8, 〈粵觚

遺憾的是，文中提到的「募役購薪」收屍焚骸的紫衣僧，不知何許人。位於廣州城東門附近的「共塚」，則成為本地人悼念此次浩劫的場所。乾隆《番禺縣志》卷五收錄〈會塚行〉詩一首，即是時人至「共塚」祭奠亡靈後而作，有云：

平原黯黯雲腳垂，白楊樹底遊魂歸。滄海已銷精衛恨，青山無復  
杜鵑啼。憶昨陰風暗南土，長林夜夜髑髏語。蒼苔古道無人行，  
燐燐鬼火燒秋雨。枯骸朽骨烏鳶餘，總是當年瓊樹枝。燃腹為燈  
寧自照，漆頭作器任人為。<sup>57</sup>

該詩自注云「侍御田公及義士王潛父也」，乾隆《番禺縣志》作者推測田侍御可能是順治十二年(1655)任廣東副使的田希尹，而王義士可能為王鳴雷，認為二人的義舉可比肩元代唐珙(1247-?)、林景熙(1242-1301)冒死收埋被元僧盜掘的宋帝陵遺骨之忠善事蹟，並認為二藩「不能仰體聖朝好生之意」，攻陷廣州後的濫殺導致「禍鍾其身，及厥子孫」，其興亂後的下場便是報應。<sup>58</sup>這樣的說辭，在譴責兩藩惡行的同時，也為清廷洗白，在當時環境下只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說法。該縣志還記載廣州城陷後，尚可喜等「屠城，死者七十萬人，民居遂空，兩藩兵因盡入居住，號為老城」。<sup>59</sup>仇巨川《羊城古鈔》採納此說，<sup>60</sup>但這一數據不知從何而來，亦不知是否包含各屬縣死難人數。

曾任廣東高明知縣的江蘇吳江縣人鈕琇，在其完成於 1700 年(康

下·共塚》，頁 2。

<sup>57</sup> 檀萃、凌魚纂修，乾隆《番禺縣志》(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168 冊廣東府州縣志第 3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據院藏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本影印)，卷 5，〈會塚行〉，頁 33a-b。

<sup>58</sup> 檀萃、凌魚纂修，乾隆《番禺縣志》，卷 5，〈會塚行〉，頁 34a。

<sup>59</sup> 檀萃、凌魚纂修，乾隆《番禺縣志》，卷 18，〈事紀〉，頁 26b。

<sup>60</sup> 仇巨川撰，陳憲猷校注，《羊城古鈔》(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卷 4，〈事紀·平南、靖南兩王復粵東〉，頁 364。

熙二十九年)的《觚賸》中有《粵觚》二卷，收錄了王鳴雷〈祭共塚文〉的敘文部分，但添加了數句：「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孝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sup>61</sup>仇巨川《羊城古鈔》卷三「共塚」條、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二〈雜錄三〉又從《觚賸》中抄錄了王鳴雷的文字。<sup>62</sup>廣州城東門附近的共塚、大坎壑不知存在了多長時間，「延侶結壇」、「伊蒲之祭」的祭奠儀式也不知持續至何時，但王鳴雷的悼念文字在後世不斷出現於地方文獻之中，成為了遇難蒼生的「紙上祠堂」。<sup>63</sup>

#### 四、歐洲人立場：《韃靼人攻陷廣州城記》

明清鼎革期間，有數十名西洋傳教士傳教於中國十餘個省份，作為親歷者的他們寫了一批書信、報告和著作，記錄這場政治、軍事和社會劇變。<sup>64</sup>關於廣州庚寅之劫，也有數種西文文獻可供參考，其中最為原始的當數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的報告《韃靼人包圍廣州期間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在此期間和廣州被攻陷期間神父們所做的事情》(以下簡稱為《韃靼人攻陷廣州城記》)。<sup>65</sup>這份報告雖然是由當時在澳門的葡萄牙

<sup>61</sup> 鈕琇，《觚賸》，卷8，〈粵觚下·共塚〉，頁2。

<sup>62</sup> 仇巨川撰，陳憲猷校注，《羊城古鈔》，卷3，頁299；光緒《廣州府志》，卷162，〈雜錄三〉，頁3b-4a。

<sup>63</sup> 「紙上祠堂」一語乃借用段志強的說法，參見段志強，《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第一章，頁26-57。

<sup>64</sup> 關於由傳教士書寫，有關明清鼎革的西文文獻及其價值，參見董少新，〈淺談全球史的史料問題——以明清鼎革史的西文原始史料為中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8：5(北京，2018)，頁38-45。

<sup>65</sup> Álvaro Semedo, *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耶穌會士若澤·蒙塔尼亞(José Montanha)於 1653 年編纂，但報告中有幾處以第一人稱講述，且手稿中有一處明確標出曾德昭之名，因此可以斷定其作者為曾德昭，且原報告應該寫於廣州城陷後不久。

曾德昭早在 1613 年便已來華，1637 年返回歐洲處理教區事務，十年後又來到澳門。1649 年 3 月 28 日，曾德昭抵達廣州，接替剛剛去世的畢方濟掌管廣州教務。從清軍越過梅嶺至攻下廣州城，曾德昭一直在廣州傳教，經歷了圍城、攻城、屠城的整個過程。他的這份葡文報告，中譯本共約 8700 字，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第一部分回顧了清軍攻入北京後一路南下、先後消滅弘光、隆武兩個政權的過程，以及永曆稱帝、李成棟攻陷廣州並歸順永曆政權；第二部分講述曾德昭從澳門前往廣州途中在肇慶逗留 22 日的經歷；第三部分是該報告的主體，詳細講述了清軍包圍和攻陷廣州城過程中，曾德昭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包含了不少不見於中文文獻的資訊。關於清軍攻城、圍城的過程，曾德昭寫道：

1650 年 4 月，傳來了確切的警報，韃靼人已經越過山嶺進入廣東了。而且在 3 月 1 日，從城牆上已經能夠看到他們了。他們有超過三萬人，而守衛的中國兵力少很多。

他們休息了三天，第四天他們便開始攻城，用梯子和其他機械翻越和撞擊城牆。傳來的巨響，我們在距離半里格之遙的住院都能夠清楚聽到。他們被認為具有獅子的品質，用它們的吼叫聲摧毀中國人。

---

tomou, 1653, BA, JA, 49-V-61, fls. 252v-260, 668-675v. 該文獻已由筆者翻譯成中文發表，見董少新，〈曾德昭《韃靼人攻陷廣州城記》譯註並序〉，《海洋史研究》，第 19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頁 254-269。本文引用該文獻仍注原手稿頁碼。

而他們(按:指守城明軍)用的是炮彈、火藥包和弓箭,猛烈還擊,不給瀕臨城下的梯子和其他攻城機械留有空間,韃靼人不得不撤退,死傷 600 餘人。

經此一役,韃靼人感到害怕了,而中國人則備受鼓舞。圍城已在進行中。除了這一次的勝利,中國人還有很多值得高興的事,不管是來自陸地還是海上。他們在海上有強大的艦隊,沿海一線一直有兩個口岸開放著,所有必需物資從那裡進來,這樣一來,儘管物價已經上漲,但一點都不短缺。因此,被圍困其中而無法突圍的人們沒有放棄希望,儘管仍在恐慌之中。

這期間廣州教堂已經有三位神父,因為澳門方面不知道廣州的狀況,於是不合時宜地派遣了兩位神父前來廣州。他們一起抵達,帶來了一些有關韃靼人的消息。廣州的形勢已如此惡化,海上的形勢也錯綜複雜,儘管此前已經到達廣州的這位神父(按:即曾德昭)設法幫助他們,也是無能為力。但由於圍城持續很長時間,期間有機會把這兩位神父派遣回澳門,以讓他們獲得安全庇護。圍城已經持續九個月了,韃靼人仍沒有攻城的動作,不管哪面城牆都沒有展開攻擊。在西城牆外有一個很大的郊區,幾乎就是一座城市,被稱為漳州人區(bairro dos Chinceos),因為那裡居住著很多來自那個省(福建)的人。這個區沒有城牆,人們把街道封堵上,並盡可能地修建防禦工事;在最危險的那些區域,他們設置了三座堡壘,可以裝備 30 門火炮,每座堡壘配備 10 門,並駐紮大量士兵。

11 月 22 日晚,兩千士兵突然向這些堡壘撲來,點燃了一個火藥桶,隨後附近一座房屋也著火了,其他堡壘的士兵見那座堡壘已被韃靼人攻佔,便亂了陣腳,棄堡壘而逃,於是韃靼人又奪取了其他堡壘及其火炮。韃靼人立即把這些火炮用於攻擊城牆,加上

他們原有的 20 門火炮，共計達到了 50 門。<sup>66</sup>攻城戰開始於 23 日與 24 日之間的晚上，如此之激烈，沒有一刻沒有轟鳴的炮聲。<sup>67</sup>至清晨，城牆已被炸開兩個大缺口；由於戰馬無法攀爬城牆廢墟，無數的韃靼士兵便徒步強行湧入。然而他們在城牆腳下的空地上遭到大量長矛和火藥包阻擊，那片戰場屍橫遍地。韃靼人猛攻三次，三次都遭到阻擊。<sup>68</sup>最出色的那些將領奮戰在第一線，總督(按：應指永曆朝兩廣總督杜永和)也親自督戰。總督帶著兩大箱銀子，用以激勵英勇戰鬥，因為的確缺少英勇的戰士。總督獎賞了一位來自澳門的士兵，該士兵用一發大手榴彈造成敵軍的一片慘叫，總督隨即給了他 50 兩白銀。他們就是這樣根據能力頒發獎賞的。

由於雙方戰鬥激烈，總督和在前線助戰的主要官員們聚集一處商討對策。軍隊的士氣已開始低落了，一部分軍隊似已撤退了。他們在附近有海軍艦隊，艦隊一來，總督和主要官員便立即登上

66 釋今釋，《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頁 156-157)載：「[十月]二十九日，[平南]王指授方略，以西關迤北一隅可以架炮攻取。分發兩藩各鎮總兵班志富、連得成、郭虎、高進庫等，率兵棄馬，徒步涉淖泥而前，奮勇砍開西關外濠木柵，自長橋南趨新築小城，從垛口騰上，遂克西關。」十月二十九日為西曆 11 月 22 日，「新築小城」應即「漳州人區」，與曾德昭所記一致。

67 「沒有一刻」原文為 *huá Ave Maria*，意指做一次萬福瑪利亞祈禱的時間。

68 釋今釋，《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頁 157)載：「十一月朔二日克廣州：先一日三鼓，列砲攻城。日午，西門背面城崩三十餘丈。時城身猶余丈許，攻者爭上城上，砲火矢石如雨，死傷頗多。」可資對照。十一月朔二日為西曆 11 月 25 日，「先一日三鼓」即 11 月 23 日晚 23 點至 24 日凌晨 1 點，與曾德昭所記時間完全一致。

了艦船，從而將靠近江岸一側的城牆棄置不顧，於是韃靼人幾乎不動手就進來了。<sup>69</sup>

曾德昭這份報告詳細程度堪比尚可喜、耿繼茂的《題本》，只是敘述角度和立場不同，內容互有側重。其所記攻城時間與中文文獻完全一致，所記攻城過程亦大體相合，而諸如清軍首次攻城死傷 600 餘人、受圍期間廣州城的補給與物價、西關被稱為漳州人區、西關輔城建有三座堡壘且每座堡壘裝備十門火炮、明軍守城之英勇、總督臨陣指揮的方式等內容，多不見於中文文獻。可以說，這份報告是目前所見從守城方角度對此次戰役記載最為詳細的資料。當然，作為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特意記述了一位來自澳門的士兵的上佳表現。

根據此報告記述，11 月 24 日上午，曾德昭在耶穌會廣州住院中聽婦女教友告解，下午則前往城牆邊一處主持懺悔禮，至五點多時一位男僕大聲喊道：「神父，士兵們已經放棄城牆逃跑了！」則清兵攻入廣州城內也大約在此時。從 23 日子時至此，激烈的廣州保衛戰已經打了約 17 個小時。曾德昭聞訊急忙趕回住院，一路上目睹了城內居民慌亂中的慘況。報告中寫道：

神父來到市區，人們已不能在街上穿行，男人、女人和孩子帶著能夠帶的東西慌亂逃跑，但是在匆忙翻越路障時都摔倒了，懷裡抱著的孩子也不能倖免。人們朝著臨江的兩個城門奔去，這兩個城門已經開了。大批人群朝這兩個城門跑去，騎馬的人卡在人群之中無法通行，進退兩難，一部分人被蹂躪而死，一部分人因擠壓而死，僅此處屍體便堆成了兩座山。那些緊急之中擺脫了這一

<sup>69</sup> Álvaro Semedo, *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tomou*, fls. 255v-256v.

困境的人們，也沒有更多自救的辦法，因為韃靼人的騎兵和步兵已經抵達江邊灘塗，大開殺戒。<sup>70</sup>

曾德昭回到住院後，與住院中的人度過了一個相對安寧的夜晚，25日凌晨兩點，曾德昭做了彌撒，領了聖體，祈禱天主護佑，但在快七點的時候，廣州城的動盪再次開始了，「大屠殺排山倒海般來臨了，暴風雨也到了我們的住院」，四個清軍士兵闖入住院，殺死一名教徒士兵，婦女和兒童被關入一間小室，男人都被捆綁起來，住院和教堂中的物品遭到洗劫；入夜後，清兵殺掉了這批俘虜的大部分，僅留數人以便讓其搬運東西。一個清軍軍官想把教堂和住院當作其營房，因此將未殺掉的數人轉移至他處。押解過程中已年邁的曾德昭神父被要求用扁擔挑著一些雞。在穿行城區時，曾德昭再次目睹了清軍屠城暴行，報告寫道：

一行人穿過了城市的一部分，所經之處看到一片慘境。街上滿是死屍，房屋裡已經沒有任何中國人了，因為在韃靼人進入該城以來的將近兩天的時間裡，如果自己的家中什麼都沒有，那麼，要麼被殺死，要麼在其他人家中被俘虜。……

韃靼人在城中屠殺了整整五天，至少有一萬五千人被殺。第五天(11月28日)的下午，一份佈告(chapa)頒佈了，宣佈不再殺害更多人了。當整個城市更像一座墳墓、死的人比活的人還多之後，彎刀停下來了。<sup>71</sup>

---

<sup>70</sup> Álvaro Semedo, *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tomou*, fl. 257.

<sup>71</sup> Álvaro Semedo, *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tomou*, fl. 259.



據此，從 11 月 24 日算起，則清軍在廣州城的屠殺一直持續到 11 月 28 日。至 28 日下午，清軍頒佈了停止殺戮的告示，而曾德昭很可能見過這個告示。這是有關庚寅之劫的原始文獻中唯一記載清軍屠城時間和屠殺人數的文獻。作為親歷者，其對屠城時長的記載應該是準確的，至於遭到屠殺的人數，考慮到當時很難有準確的統計，應該是曾德昭的估計，未必準確。此外，一萬五千人被殺，其中應該不包括溺死、踩踏而死者。至於報告中所說當「死的人比活的人還多之後，彎刀停下來了」，因為也有大量居民逃出城外，故不能由此得出廣州人口死亡過半的結論，但仍可知屠城造成龐大的傷亡人數。曾德昭說清軍發佈告示後，「城外已經知道城中不殺中國人了，相反還通過派發糧食的方式來安撫他們，於是人們開始往城裡聚合了，特別是那些從城裡逃出來的人和附近村鎮的人。」<sup>72</sup>

庚寅之劫對耶穌會廣州住院造成了嚴重破壞，住院和教堂被清軍佔據，財產、物品被洗劫一空，很多教徒被害。而曾德昭本人還算幸運，因為靖南王子耿繼茂手下有一位來自北京的奉教太監，教名彌額爾(Miguel)，他告訴耿繼茂俘虜中有一個神父。可能是因為耿繼茂之父耿仲明曾是登萊巡撫、著名奉教官員孫元化(1581-1632)的部下，因此耿繼茂對傳教士亦相當友好。他接見了曾德昭神父，給了他「齊全的衣物、一頭豬、幾隻雞和兩簍子白米」，在自己住處附近給神父安排幾間房屋；後來耿繼茂家眷來到廣州，曾德昭只好搬到一位教友家中居住，但耿繼茂多次承諾要為他建一座教堂。<sup>73</sup>耿繼茂是否兌現承諾，

<sup>72</sup> Álvaro Semedo, *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tomou*, fl. 259.

<sup>73</sup> Álvaro Semedo, *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我們暫時不得而知，想必其捐建教堂的熱情是遠不如捐建得勝廟的。

曾德昭的報告很快在來華耶穌會士中傳播開來。1651年3月5日從福建登船返回歐洲的衛匡國已經讀到了該報告的某個抄本，並將廣州城陷落和曾德昭的遭遇寫入他的《韃靼戰紀》。衛匡國寫道：

廣州是富庶美麗之地，大江環繞，是南方僅有的內陸港，可通船隻。前述被囚一官(Iquon)之子在城內，另有一支強大艦隊防守，其中有很多從澳門逃來者，為高報酬而效力於永曆帝。韃靼人既無艦隊，又不會駕船技術，而該城則兩者皆有，無怪乎能承受近一年的圍困，而且有來自海上的援助。但韃靼人多次進攻，傷亡慘重，總是被猛烈擊退。守軍的士氣使韃靼人決定用大炮轟擊城牆，此舉果然奏效，最終在1650年11月24日攻破城牆。據說韃靼人承諾廣州某官，佔領廣州後他將保持原來官位，因此有人懷疑城破是因為該官員的叛變。第二天，韃靼人開始洗劫該城，從11月24日一直持續至12月5日，不分男女老少，所有人都被殘酷地置於屠刀之下；只聽到他們喊道：「殺，殺掉這些野蠻的叛徒！」但他們免殺了一些工匠，以保存必需的工藝，還留下一些健壯的男人，替他們搬運城內的戰利品。最後在12月6日頒布告示，禁止進一步屠殺，至此他們已殺了十萬人，這還不包括圍城期間死於種種因素的人。這場血腥慘劇後，附近省份主動遣使投誠，請求寬恕，奉獻厚禮求赦免。接著，王爺率軍進攻永曆駐蹕的肇慶城，永曆知道兵力不敵，不能抵抗，帶著全部軍隊和家室逃跑，把城留給韃靼人。但我完全不知道這個皇帝逃往何處，因為我當時正乘船從福建去菲律賓，奉上司必須服從的命

令，我將從菲律賓赴歐洲。但我肯定，皇帝撤退至鄰近的廣西省了。

……[在廣州]有一位受尊敬的人照顧著所有教徒，他叫曾德昭，耶穌會士。他們捆住他的手腳，過了好幾天，威脅他說，除非他交出基督徒的財產，否則隨時可以殺死他，但這個可憐的人拿不出來。他受苦深重，最後王爺知道這件事，憐憫他白髮蒼蒼，身虛體弱，不僅賜他生命和自由，還賜他一本聖經和禱告書，施捨大量金錢，最後給他一所房屋，讓基督徒作教堂。這位王爺的行為，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他曾在我前面提到的著名的孫依納爵手下當兵，他知道什麼是基督教，還曾在他的營盤裡見過耶穌會士，後來他才投奔韃靼。<sup>74</sup>

衛匡國的記載與曾德昭的報告有多處不一致，例如說一官的兒子(即鄭成功)駐紮在廣州城內，其他中西文獻均無此說；又如說屠殺持續到12月5日，十萬人遭殺害，不知這些說法從何而來；其關於曾德昭遭遇的敘述，則大體與曾德昭本人所言相合，但曾德昭並未提及耿繼茂賜其聖經和禱告書。衛匡國關於此次廣州城陷的記載，除了曾德昭的報告之外，應該也參考了其他我們尚未見到的文獻，或許他還根據傳聞添加了一些未必準確的內容。在沒有發現其他證據之前，衛匡國的說法需謹慎對待，畢竟他本人並未親身經歷廣州庚寅之劫。

聶伯多(Pietro Canevari, 1594-1675)神父1651年12月31日在贛州編寫的《1651年耶穌會中國年信》也大量引述曾德昭的報告。該年信第一

<sup>74</sup> Martino Martini,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by the Invasion of the Tartars*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Crook, 1654), 189-194. 引文參考了何高濟先生的譯文(衛匡國著，何高濟譯，《韃靼戰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386-388)，但也對何譯做了修訂。

部分分為 18 章，其中涉及到庚寅之劫的包括第 15 章〈擁有三萬騎兵和步兵的韃靼大軍抵達並發動首次攻城〉、第 16 章〈韃靼人攻取城外漳州人區的三座堡壘，在其中裝備 50 門火炮並以此攻入城內，在城內展開屠殺〉和第 17 章〈教會、教友和曾德昭神父的遭遇〉。<sup>75</sup>有意思的是，聶伯多在這份報告中用了不少篇幅講軍事理論，對廣州保衛戰的戰略得失做了分析，這在耶穌會年信中是很罕見的。該年信中關於清軍攻城、廣州城陷的部分還有一些內容不見於蒙塔尼亞編輯的曾德昭報告。例如年信中提及清軍所駐紮的山丘有很多廣州市民的墓地，清軍挖出棺材用以取火，「這件事大大地刺激了城中的人」；<sup>76</sup>並說總督(指杜永和)在守城中受傷，然後撤退至河中的船上。<sup>77</sup>這或許是因為聶伯多參考了其他資料，也或許蒙塔尼亞在編輯過程中刪除了曾德昭原報告中的部分內容。

另一記錄廣州庚寅之劫的西文文獻是 1655-1657 年隨荷蘭使節杯突高嚙(Pieter de Goyer)和惹諾皆色(Jacob Keyzer)訪華的使團畫師尼霍夫的書。1658 年，尼霍夫將其所寫的此次出使記錄交給他的兄弟亨德里克(Hendrik)，經其整理和編寫，於 1665 年由出版商范梅爾斯(Jacob van Meurs, 1619/1620-約 1680)出版。<sup>78</sup>該書很快被翻譯成法文、德文、拉丁文和英文。上世紀八〇年代，尼霍夫此書原稿被發現，並被翻譯成中文，收入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莊國土合著的《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其中涉及庚寅之劫的部分是這樣寫的：

---

<sup>75</sup> Pietro Canevari, *Carta Annua da China, A. 1651*, 31 Dezembro, 1651, Camcheu. BA, JA, 49-V-61, fls. 111-118v.

<sup>76</sup> Pietro Canevari, *Carta Annua da China, A. 1651*, BA, JA, 49-V-61, fl. 113.

<sup>77</sup> Pietro Canevari, *Carta Annua da China, A. 1651*, BA, JA, 49-V-61, fl. 115v.

<sup>78</sup> 荷蘭文版 Johan Nieuhof, *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 (Leyde: Jacob van Meurs, 1665).

據說該城在戰爭之前商業非常繁榮，以致由於人流擁擠，每天在城門裡都有五、六人擠死。如果考慮到附近這麼多村鎮的人在這裡相互擁擠，那麼這個說法是可信的。該城被韃靼人攻佔過兩次。韃靼人告訴我們，在最後一次圍城中，除了因饑餓和其他不幸而死亡的人們外，尚有八萬人以上被殺，因為有人告訴了我完整的圍城情況，所以我應當把那時發生的一些重要事情略作敘述。韃靼人集中全部軍力，盡可能地縮小包圍圈，在幾處要地發起猛攻。但中國人抵抗得極好，韃靼人不得不幾次在喪失很大兵力之後撤退。後來，中國人在幾個望加錫(Maccasa)人和二個荷蘭炮手的帶領下，向城外突擊數次。這二位荷蘭人在這裡結婚，而且在中國人中聲譽很好。韃靼人動員了不計其數的人力在城東端前面的河上造了一道橋，為的是要將廣州通虎門和其他地方的交通切斷。中國守軍等他們把橋造好後，在一個早晨突然出擊，首先攻下一個半月型的堡壘，這個堡壘是專門造來保護浮橋的，然後放火燒掉浮橋下的船隻，數月建成的工事和浮橋就這樣在一個小時內就毀壞無遺了。圍城軍隊為之喪膽，不敢再準備用武力攻佔這座城市。他們經過討論後，決定與守城的某個長官聯繫，告訴他如果願意開城投降，則軍中最有權勢的二位藩王將送他四萬兩銀子並締結永久的友誼。那位叛徒接受了這些條件，並且訂好了韃靼人進城的時間。韃靼人依約而來，發現城門未鎖，就立刻進城，攻佔了府衙，並騎馬到各條街道攔截中國人，使他們不能聚集在一起。韃靼人面對的是那些饑餓畏縮而又措手不及的人們，征服者真是時來運轉。這些中國人要逃命已經太遲了，韃靼人開始屠殺，無論男女老少無一倖免。他們逢人就殺，一直殺到血流滿街，令人血腥欲吐，才因此罷手。雖然這僅是七

年前才發生的事情，但在七年期間，這個城市在二位藩王的統治下，已經幾乎恢復當年的盛況了。<sup>79</sup>

荷蘭使團抵達廣州後停留了數月，於 1656 年 3 月 17 日才獲准啟程前往北京。1656 年 10 月 16 日荷蘭使團離開北京，後經廣州離開中國。尼霍夫隨使團首次途經廣州時，見過尚可喜，且為尚可喜、尚之信畫像。此段文字講到「這僅是七年前才發生的事情」，則尼霍夫寫下此段文字的時間應在 1657 年前後。尼霍夫這段記載的部分內容可能參考了出版於 1654 年的衛匡國《韃靼戰紀》，但也包含其在廣州期間聽聞的資訊。尼霍夫說「韃靼人告訴我們」、「有人告訴了我完整的圍城情況」，但未提及姓名，是否為尚可喜或尚之信，已難以考證了。其中所說「韃靼人告訴我們，在最後一次圍城中，除了因饑餓和其他不幸而死亡的人們外，尚有八萬人以上被殺」，如果這是尚藩告訴尼霍夫的，則「八萬人以上」的遇害者數據或許源自屠城後兩藩的統計，該數字已遠超《題本》中所提供的。至於「據說該城在戰爭之前商業非常繁榮」、「這個城市在二位藩王的統治下，已經幾乎恢復當年的盛況了」云云，均體現出荷蘭使節團記錄的商業視角，與發生於七年前的屠城事件相比，他們更關心的是新王朝統治下的經商環境和貿易可能。

尼霍夫此處所謂「望加錫(Maccasa)人」當是「澳門人(Macaense)」之誤，曾德昭報告提及的獲得總督 50 兩白銀獎勵的澳門士兵，應該就是其中之一。此前有兩批澳門武裝到肇慶支援永曆朝：第一次是 1646 年龐天壽(1588-1657)隨畢方濟前往澳門搬兵，尚未返回之時，聞知福京已破，遂帶領 300 葡兵前往肇慶，擁戴永曆帝；第二次是龐天壽奉永曆帝命，率使團於 1648 年 10 月 17 日抵達澳門，以答謝天主及澳門

79 約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原著，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莊國土著，《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頁 54-55。

教會使皇子康復之恩，返回時澳門教會贈送了 100 枝火槍，並有一些葡國和澳門本地士兵隨之前往肇慶助戰。<sup>80</sup>這些澳門士兵中便有一部分人被派往廣州參與守城，曾德昭抵達廣州時，他們聚集在住院歡迎神父的到來。<sup>81</sup>作為荷蘭人的尼霍夫特意提到守城戰中兩個荷蘭炮手的英勇表現，但這一點亦不見於任何其他文獻的記載，不知是否為尼霍夫的杜撰。值得注意的是，尼霍夫提到兩藩用「四萬兩銀子」收買了某一守城軍官，這個叛徒故意不鎖城門導致清軍進入廣州。范承恩變節一說，在清代文獻中很常見，但目前所見最為原始的文獻——1650 年《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中並無此說(見前文)，尼霍夫這一記述表明至少在 1656 年，范承恩通敵的說法便已流傳開來。

尼霍夫的這份荷蘭文原稿從未以原貌出版，因此其在歐洲的讀者和影響範圍有限。真正被廣泛閱讀的是經其兄弟亨德里克和出版商范梅爾斯改編過的荷蘭文版本，以及從該版本翻譯出版的法文、德文和英文版本。與原稿本對比可以看出，該版本在對庚寅之劫的敘述上更為詳細，增加了很多細節。亨德里克和范梅爾斯的改編應非任意增刪，很可能依據了他們當時所掌握的其他資料，因此不可簡單地認為其不可靠。事實上，以往學者在研究中涉及庚寅之劫時，大都引用該書荷蘭文版本的英譯本。<sup>82</sup>該英譯本於 1669 年首版，1673 年再版，但至今

<sup>80</sup> 參見董少新，〈明末奉教太監龐天壽考〉，《復旦學報》，2010：1(上海，2010)，頁 35-44。

<sup>81</sup> Álvaro Semedo, *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tomou*, fls. 255-255v.

<sup>82</sup> 如 E. C. Bowra,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anton" 在 92-93 頁做了長篇徵引；又如司徒琳《南明史》於頁 131 引用了英文版中的兩段文字。中國學者的研究中涉及庚寅之劫時，大都從司徒琳該書轉引，如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頁 27-28；林子雄，〈清初兩藩攻佔廣州史實探微〉，頁 10。

無中譯本，因此有必要將其中對庚寅之劫的敘述翻譯、引述於此：

人們說在上次戰爭之前，廣州人口眾多，交通繁忙，以致於每天都有五六個人在通過城門時被擠死。……此城曾兩度被武力征服，人們說在後一次圍城中，有超過十萬人被屠。我將向你們簡述在那次恐怖而血腥的入侵期間廣州所發生的事情。

……該城的軍事力量一點兒也不能給城中的中國居民帶來鼓舞，但是他們有一官的支持，一官統帥一支強大的艦隊，每天為該城提供一切必要的補給，而韃靼人無法阻止這一補給，因為他們缺少海上軍事力量，在海事方面不擅長。但是圍城者作為戰場之王，要不惜一切代價以武力拿下廣州。他們三次強攻，但都被守城者勇猛地擊退，人員和武器損失慘重。居民們的頑強守衛使圍城持續了一整年；他們強大的城池和守軍讓他們得以抵禦圍城者如此多的進攻，這讓他們終於發現他們有必要以全部的兵力開展一次總的反圍剿，或者在被圍困中聯合更多部隊增強實力。但在對韃靼人造成最多傷害的人中，有兩名荷蘭炮手。他們已與中國婦女結婚，並在那裡定居了。通過他們的建議和指揮，該城多堅守了數月之久；但最後韃靼人用大炮在城牆上打開一個大缺口，這本可以鼓舞他們進行一次總攻，然而他們認為最好暫緩攻城，一直等到他們策反幾名守城官，並且達成裡應外合的計謀，這樣他們就將不再擔心攻城失敗。

我們逗留廣州期間統治該省的兩位總督當時是韃靼人軍隊的統帥。他們極力以巨大的承諾和巨額金錢收買廣州城的總督，用這樣的話對其進行威逼利誘：「他應該考慮到其已身處危境，大難臨頭；若自珍並愛家人，他應該立刻放棄這座城市；他若如此襄助，他們許諾報以永恆的友誼、升官以及四萬兩白銀。」



這位懦弱且無信念的中國總督，不管是因為內心害怕，還是因為金錢和豐厚承諾的誘惑，總之是，他原本有可能很好地守住城池，但卻違背他的誓言和榮譽，向韃靼統帥做了承諾，在某一刻為攻城者打開一道城門。他履行了諾言，這麼做了。

那是 1650 年 11 月 24 日。當韃靼人利用這個便利全部湧入城中，整個城市很快被奪取了，而守城者還來不及做出任何抵抗，因為韃靼鐵騎極速進入，疾馳於所有街道上，以阻止中國人集合。儘管中國人在人數上與韃靼人對比並不占劣勢，但是卻無法有效施展出抵抗的力量，亂作一團，而且對他們總督的變節感到震驚。於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好選擇就是逃命。韃靼全軍進城後，該城隨即呈現出一幅慘像。每個士兵都打砸，搶奪一切兩手所及之物。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哀號聲蓋過一切嘈雜聲。從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5 日，街上聽不到哭聲了，只有「打！殺！消滅這些叛變的蠻子！」到處都充斥著可悲的哀鳴、屠殺和劫掠。那些能夠交得起贖金的人，以高昂的價格買命，並因此得以逃出無人性的屠夫魔掌。最後，兩位總督，即韃靼軍隊統帥，在冬月 6 日 (the sixth of winter-month) 嚴厲禁止此後施行任何如此殘忍的殺戮。<sup>83</sup>據我得到的可靠消息，在這 80 天中，有超過八千人被韃靼人冷血地殺害。有人(其中包括耶穌會士衛匡國，在其有關韃靼戰爭的書中)說，被殺者有十萬以上。考慮到被圍困在城中的人數之大，則這一說法並非完全不可能。但儘管此城被可悲地重創成廢墟，通過兩位總督的精心統治，她在短短幾年後又恢復了昔日的繁榮。<sup>84</sup>

<sup>83</sup> 但這裡不是農曆，而是指西曆 12 月 6 日，與衛匡國《韃靼戰紀》中一致。

<sup>84</sup> Johannes Nieuh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delivered by their excellencies Peter Goyer and Jacob de Keyzer* (London, 1673 second edition), 37-39.

將英譯本與 1665 年出版的荷蘭文本對比可以發現，英譯本存在很大的問題。「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5 日」荷蘭文本為「自屠宰月(按：即 11 月)的 26 日至冬月(按：即 12 月)5 日」；「在這 80 天中，有超過八千人被韃靼人冷血地殺害」，在荷蘭文本中則為「在這幾天裡，有八萬人死掉」。因此英譯本中的這些日期和數字，不能作為研究廣州庚寅之劫的依據。然而，英譯本有其讀者群和影響面，導致「變形了的」庚寅之劫印象在英文本讀者中流傳。後世學者如包臘、司徒琳等，在從英譯本中引述這段史料時，也只做了部分修訂。另外，英譯本中將廣州的「總督」描述為守城方的通敵者，而紐霍夫原稿中只說守城的一位官員被韃靼人收買了。又荷蘭文本在提及八萬人的死亡數字時，尤其強調了是「城裡的居民親口告訴我」的，<sup>85</sup>此與尼霍夫原稿所記「韃靼人告訴我們」不同。

1666 年楊光先教案爆發後，各地西洋傳教士被逐至廣州軟禁，十餘年前的廣州庚寅之劫也成為這些傳教士的談資。西班牙多明我會士閔明我在其書《論君主制中國的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中寫道：

最讓中國人害怕的是韃靼人建的一座比城牆高的木製城堡。韃靼人從上面一開火，中國人便放棄了城牆。一個名叫佩德羅·卡瓦略(Peter Carvalho)的葡萄牙混血兒發現城牆上就剩他一個人了，便趕緊逃走了。他告訴我，只要有兩百名配備火器的人堅守崗位，他們將一定能夠擊退韃靼人，並讓他們攻城器具作廢。曾德昭神父和成際理兩位葡萄牙神父當時在城中，後者告訴我們多次，儘管遭遇諸多艱難，他最終還是肩上扛著火槍逃出來了；

---

<sup>85</sup> 荷蘭文本的這些資訊見 Joan Nieuhof, *Het Gezantschap der Nee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msterdam, 1665), 44. 感謝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鄭永君博士幫忙翻譯此段文獻。

韃靼人抓住了前者，並從他那裡搶了很多錢，這是何大化神父在  
那個城中告訴我們的。<sup>86</sup>

《平南王元功垂範》中提及攻城前準備了飛車、天橋、哈哈木等攻城器，閔明我所說的「木製城堡」或即此類器具，但其清軍一開炮明軍就放棄城牆的說法不確，前引中西文獻均可證明明軍曾頑強抵抗。閔明我提及的混血兒卡瓦略無疑是來自澳門的援明銃手，至 1660 年代仍生活在廣州，且與軟禁於此的傳教士們見過面。至於曾德昭的經歷，則是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ia, 1592-1677)告訴閔明我的，說明何大化應該讀過曾德昭的報告或耶穌會中國年信資料。對成際理(Feliciano Pacheco, 1622-1687)的描述是否準確則尚有疑問，曾德昭在其報告中曾說清軍圍城期間從澳門又來了兩位神父，並且此二人在城陷之前已返回澳門；儘管曾德昭在該報告中沒有提及此二人的姓名，但在他於 1650 年 10 月 25 日從廣州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提到，這兩位神父為汪儒望(Jean Valat, 約 1614-1696)和成際理。<sup>87</sup>

## 五、結論：庚寅之劫的歷史記憶

歷史學研究一向注重原始文獻的發掘和使用，概因文獻愈原始，其所載之內容愈有可能貼近真相。就一個歷史事件而言，其原始文獻應該滿足這樣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文獻作者是該事件的參與者或親歷者，換言之就是該事件發生時文獻作者在場，目睹了事件發生的全部

<sup>86</sup> Domingo Fernandez Navarette,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 369.

<sup>87</sup> 見耶穌會羅馬檔案館 Jap.-Sin. 161 II, f. 353; 轉引自 Isabel Murta Pina, "In the Eye(s) of the Storm(s): Álvaro Semedo, an Observer of Two Dynastic Transitions in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 186.

或部分過程；二是文獻撰寫於事件發生期間，或者起碼距離事件發生後不久。以此為標準，目前所見有關庚寅之劫的原始文獻主要有兩藩《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王鳴雷《祭共塚文》和曾德昭《韃靼人攻陷廣州城記》。這三份文獻的敘述角度和立場分別代表征服者、廣州人民和天主教會，因此所述內容也各有側重，且具有一定的互補性。若想揭示庚寅之劫的真相並對其做客觀的評價，則需要綜合使用這三份文獻。誠如陳賢波所言：「重大歷史事件本身錯綜複雜，立場不同，取材有別，相關記載自然呈現『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視差，『解碼』這些或隱或現的歧異之處，有助於後人撬開歷史的隱秘角落。」<sup>88</sup>但不可否認的是，以往有關庚寅之劫的研究均未同時使用此三份原始文獻，對後出的文獻也多直接徵引而少辨析，致使關於庚寅之劫的相關史事仍是眾說紛紜。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即使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利用這三份文獻，也無法弄清庚寅之劫的全貌，有些方面恐怕後人永遠無法知道真相了。例如關於庚寅之劫的死難人數，《題本》說擊斃明官兵六千人，且在南門外溺斃百姓「無算」；王鳴雷未言及人數，曾德昭說清軍屠殺持續五日，並估計被殺者超一萬五千人。庚寅之劫的死難人數應包括清軍攻城至宣佈停止屠殺的這段時間中，清軍殲滅的明軍人數、入城後屠殺軍民人數、因城中陷入混亂導致擁擠踩踏而死的人數、在城內河渠中淹死者人數、逃至南門外淹死於江中的人數之總和，但在《題本》和曾德昭的報告中，死難數字僅包括其中的一部分。雇人收埋屍首的紫衣和尚沒有為我們留下其所收集的遺體數量，而且溺死於珠江中的屍體應該不在其收集之列。最有機會對死難者人數做比較準確統計的是尚可喜和耿繼茂，他們可以在戰後通過行政手段對包括清軍在內的

<sup>88</sup> 陳賢波，〈清代平定華南海盜戰爭(1790-1810)的官方紀念與歷史書寫〉，《清史研究》，2022:4(北京，2022)，頁 63。

傷亡人數做全面的普查和統計。但是他們可能並未這麼做，也可能做了但並未將資料公佈。如果當事者、親歷者沒有留下死難者的統計數字，則後世文獻中記載的數目更難被視為「信史」。我們當然不是說非原始的文獻所記載的就一定不可靠，畢竟後出文獻的作者可能使用了我們沒有見到的原始文獻。在後出文獻中，衛匡國說屠城持續至12月5日，有十萬人被殺害。他可能依據了當時的資訊，尤其是其他耶穌會士所提供的資料。尼霍夫記錄的數據為八萬人以上，這一資料來自「韃靼人」的口頭告知，但尼霍夫並未記載此「韃靼人」的姓名。如果是尚可喜或耿繼茂提供的數字，則其可靠性會更高一些。但兩藩向一個外國人提供屠殺資料的可能性不大。若來自其他清朝官員或官兵，則也是當時官員或士兵的一種估計。從常理來說，十萬或八萬的數字，比更後出的中文文獻中記載的百萬、七十萬、四十萬之數，或更為貼近史實。這也只是按常理和當時廣州城人數所做的推測，庚寅之劫的實際遇難人數或許永遠無法弄清楚了。不過屈大均、王鳴雷、曾德昭、尼霍夫的記載，讓兩藩掩蓋屠城事實的企圖成為徒勞，這正是非征服者立場的文獻價值所在。

有關庚寅之劫的後出文獻，敘述角度和立場大都在三份原始文獻的延長線上，或直接抄錄三份原始文獻的主要內容，或又綜合了其他的後出文獻和傳聞，亦不乏增加一些杜撰和想像的成分。本文分別縱向梳理了征服者、廣州人民和傳教士三種視角和立場的後世文獻。

征服者(即兩藩)視角和立場的後出文獻包括：〈東得勝廟碑記〉、〈東得勝廟鐘款〉、〈西得勝廟鐘款〉、〈太平庵鐘款〉、《平南王元功垂範》、《尚氏宗譜》、《平南親王尚可喜實跡》、〈尚可喜墓誌銘〉等，其中碑記、鐘款一類文獻撰成之時距離庚寅之劫未久，性質接近於原始文獻，但已可明顯看出兩藩對個人形象的努力營造；而《元功垂範》、《宗譜》、〈墓誌銘〉等用戲劇化的描寫進一步凸顯

尚可喜的個人形象並掩蓋殘酷屠城的罪行。這一脈文獻很多都被收入《宗譜》，為後世尚氏家族所保存、信奉，成為增強家族內部凝聚力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尚氏族人也通過進呈《平南親王尚可喜實跡》冊的形式，希望讓尚可喜在家族內的形象得到官方認可。

廣州人民視角和立場的文獻包括王鳴雷〈祭共塚文〉、屈大均詩〈猛虎行〉，以及《觚賸》、《羊城古鈔》、《番禺縣志》、《廣州府志》等。屈大均的作品遭清朝嚴厲禁毀，在清代流傳有限，城坊志、地方志一類的地方文獻通過抄錄〈祭共塚文〉部分內容，保存和延續了庚寅之劫的地方記憶。嘉、道以後，隨著文網漸鬆，關於這場苦難的歷史記憶不斷浮現，例如嘉慶、道光間番禺人方恒泰在其《橡坪詩話》中記載：「城前後左右四十里，盡行屠戮，死者六十余萬人。相傳城中人士竄伏六脈渠約六七千人，適天雨，瀆溺幾盡，其所存僅二人，雙門底劉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門甕城關帝廟神像腹中，得免誅戮。」該記載後被香山人黃佛頤(1886-1946)收入《廣州城坊志》中，<sup>89</sup>至於其來源，方恒泰未注明，暫時未知。這種地方記憶之中也包含了家族記憶，保存在廣州的一些家譜之中。例如《嶺南冼氏宗譜》記載：「清初耿、尚二王督師南下，廣州城陷，居民多匿六脈渠，以避屠戮。……值大雨傾盆，渠水暴漲，溺死者無算，」其中原居住於城西冼基的冼懋章一族「子孫僅得一人逃出，生還大羅故鄉」；又如荷塘恒美坊《李氏族譜》中有李一奇〈世變小記〉一篇，云「人民死至幾萬」。<sup>90</sup>此類記載的準確性難以考證，但家族曾經遭遇災難的記憶得以在後世代代相傳。<sup>91</sup>此外，在廣州民間還有「殺人十八甫，填

89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226。

90 轉引自羅一星，〈清初兩藩肆虐廣州考〉，頁57、60。

91 本文對嶺南家譜文獻未做深入研究，但認為家譜文獻應能發掘出更多有關庚寅之劫歷史記憶的訊息。

屍六脈渠」的傳說，其真實性和來源同樣暫不可考，但作為歷史記憶已與十八甫的地名緊緊聯繫在一起了。<sup>92</sup>

傳教士視角的文獻(包括《1651年耶穌會中國年信》和衛匡國《韃靼戰紀》等)多依據曾德昭的報告而成，其所記除了城陷過程和城中百姓的遭遇之外，對傳教士和教徒們的遭遇尤其詳細，也為我們考察庚寅之劫提供了一個「他者」的視角。此外，尼霍夫的記述雖可能參考了衛匡國的記載，但也有其在廣州期間親耳聽聞的資訊，且在傳教視角外，又提供了一個荷蘭使節的商業視角。庚寅之劫在來華歐洲人中間也形成了歷史記憶，近二十年後當傳教士被軟禁於廣州時，此一歷史事件又成為他們談論的話題。傳教士和荷蘭使節以西方的視角所形成的文獻均以歐洲文字寫成，傳到歐洲後這些著作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一版再版，從而使廣州庚寅之劫在歐洲形成了一個歷史記述的系統，如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等都轉錄、提及此事，而包臘因在粵海關供職，重拾這些歐洲記載，結合他所能找到的中文文獻而撰成〈滿洲征服廣州〉長文，該文本身也可被視為關於庚寅之劫的歐洲記述系統的延續和發展。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看到以明朝為視角和立場的原始文獻，守城的南明官員、將士或許身處危境而沒能記錄廣州的失守與被屠，又或許有人記錄而沒能保存下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載南明官員馮耀、郭瑤、施輝然死難事蹟，略帶有原始文獻的性質，但這些事蹟並非屈大均所親見。王夫之《永曆實錄》、魯可藻《嶺表紀略》、計六奇《明季南略》等，雖代表明朝視角和立場，但作者均未經歷過庚寅之劫。此類書籍長期受制於清代文網，直到晚清才陸續重現於世

<sup>92</sup> 關於此傳說，見李建青，〈廣州十八甫得名的來歷〉，《民俗》，67（廣州，1929），頁15-16。

人面前。

至晚清，廣州庚寅之劫的歷史記憶成為革命黨人推翻清朝統治的歷史資源。在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組織的討伐滿洲檄文中，庚寅之劫都是重要的內容。例如 1903 年 1 月興中會準備廣州起義，在重要參與者洪全福(1835-1910)發佈的〈討清檄文〉中寫道：

嘉定則屠戮全城，糧苗盡剝；揚州則慘殺十日，玉石俱焚。迨耿、尚之南征，成桂、粵之奇禍；五羊城外，十八甫寸草不留；六脈渠中，四萬眾殘生莫保；君臣無罪，駢首受剝洗之刑；婦孺何辜，坦胸任干戈之刺。嗚呼慘已！能勿淒然？乃復外托仁慈，陰恣狼毒，藉口輕徭薄賦，肆意吸髓敲膏。<sup>93</sup>

又如章太炎(1869-1936)於〈討滿洲檄〉中羅列了滿洲十四大罪狀，「廣州之屠」便包含在第四項罪狀之中。<sup>94</sup>章太炎亦自謂其革命思想伏根於少時讀《東華錄》所記戴名世(1653-1713)、呂留良(1629-1683)、曾靜(1679-1736)之事，<sup>95</sup>而章太炎居領導地位的「國粹運動」，其出版的《國粹叢書》刊印了大量清代禁毀的明代或明清之際著作，「打開了一個新的歷史記憶的世界。……這個記憶世界的復返與仇滿恨滿的熱情甚有關係」。<sup>96</sup>

歷史記憶是極為複雜的，至民國時期，作為清遺民的陳伯陶(1855-

93 洪全福，〈討清檄文〉，收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 1 輯(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 142。該檄文照片見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文獻叢編》，27:1(北京，1935)，書前附圖。

94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收入《章氏叢書》)，文錄卷 2，轉引自沈定平，〈明朝覆亡歷史與章太炎民族革命論〉，頁 293。

95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1，頁 5-6。

96 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構建——以章太炎為例〉，收入王汎森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74-75。



1930，1892年進士)作《勝朝粵東遺民錄》，其中便有王鳴雷傳並收錄其〈祭共塚文〉全文，其目的為「表彰明代遺民，以激勵清朝遺老，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sup>97</sup>則包括王鳴雷在內的明遺民及其遭遇，又成為清遺民紓解內心鬱結的歷史資源。當羅振玉(1866-1940)校閱內閣大庫檔案中的《平南親王尚可喜實跡》冊時，是否也懷有同樣的心境呢？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在處於滿洲國之中的尚可喜老家，其後人積極地開展《尚氏宗譜》的第五次纂修工作，新譜中不僅載入清代朝廷頒發給尚氏家族的敕諭、誥命、詔書等一百餘件，而且將《平南王元功垂範》入譜並置於十二卷之首。<sup>98</sup>上世紀九〇年代，遼寧海城尚氏宗人斥資舉辦學術會議，極力邀請著名檔案學家、明清史家韋慶遠(1928-2009)先生與會，許諾給予一筆兩萬元的報酬(約相當於當年一個教授30個月的工資)。韋先生不為心動，坦然答道：「我家鄉順德北滘鄉的人民，至今念念不忘當年尚氏父子的罪惡，我若赴會，將無面目見家鄉父老。」<sup>99</sup>順德與南海、番禺、東莞等當年皆為廣州府屬縣，可見廣州人民創鉅痛深的歷史記憶，一直延續到當代。本文所探討的有關庚寅之劫的原始文獻，其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在後世的歷史記憶中便如此延續著。

(本文於2023年8月5日收稿；2024年11月12日通過刊登)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了章文欽、孫青、關笑晶、陳拓、段志強、鄭永君、陶賦雯、胡涵菡、姜力丹、謝溫欣等師

97 謝創志，〈前言〉，收入九龍真逸(陳伯陶)撰，謝創志整理，《勝朝粵東遺民錄》，頁4。

98 王小夢，〈海城尚氏宗譜文化探析〉，頁101。

99 此條口述史料為韋慶遠先生親口告訴中山大學歷史系章文欽教授，並載於章教授2023年6月10日寫給筆者的親筆信。

友、同學的幫助，特此致謝！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專項復旦大學東亞海域史研究團隊「16-17世紀西人東來與多語種原始文獻視域下東亞海域劇變研究」（項目號：22VJXT006）的階段性成果。感謝三位匿名評審專家對本文提出的修訂意見。

### 附錄 庚寅之劫相關文獻類要(以本文所使用之文獻為主)

	持征服者立場之文獻	持廣州人民立場之文獻	西文文獻
原始文獻	尚可喜、耿繼茂〈恭報恢克廣省事〉，1650年12月8日。	王鳴雷〈祭共冢文〉，約1650年代。	曾德昭《韃靼人攻陷廣州城記》，原報告約作於1651年，本文所使用的為1653年若澤·蒙塔尼亞編輯本。
同時代文獻	尚可喜〈東得勝廟鐘款〉，順治九年(1652)三月。 尚可喜〈太平庵鐘款〉，順治九年三月。 尚可喜〈新建東西得勝廟碑〉，順治	屈大均〈猛虎行〉，1650年。 佚名〈會塚行〉，詳細年代待考。	聶伯多《1651年耶穌會中國年信》，1651年。 衛匡國《韃靼戰紀》，1654年。 尼霍夫《荷使初訪中國記》，荷蘭文原稿，約1657

	九年五月。 尚可喜《三韓尚氏宗譜》， 順治九年五月。 耿繼茂〈西得勝廟鐘款〉， 順治十年三月。		年；荷蘭文 初版，1665 年；英譯本， 1669 年、 1673年。
後世 文獻	釋今釋《平南王 元功垂範》， 1673年。 《尚氏宗譜》， 1675年。 梁清標〈皇清冊 封平南敬親 王尚公墓誌 銘〉，1680 年。 尚崇壁《平南親 王尚可喜實 跡》，雍正朝 (1722-1735)。 《尚氏宗譜》(四 修)，1791 年。	鈕琇《觚賸·粵觚》， 1700年。 乾隆《番禺縣志》。 仇巨川《羊城古 鈔》，嘉慶朝 (1796-1820)。 方恒泰《橡坪詩 話》，道光朝 (1821-1850)。 光緒《廣州府志》。	閔明我《論君主 制中國的歷 史、政治、倫 理和宗教》， 西班牙文本 1676年；英 譯本 1704 年。 杜赫德《中華帝 國全志》，法 文版 1735 年；英譯本 1738年。 龍思泰《早期澳 門史》，1832 年。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文獻

- 丁仁長、吳道鎔等纂，宣統《番禺縣續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7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據民國20年(1931)重印本影印。
- 九龍真逸(陳伯陶)撰，謝創志整理，《勝朝粵東遺民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丙編第8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仇巨川撰，陳憲猷校注，《羊城古鈔》，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 王夫之，《永曆實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點校本。
- 王夫之，《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2011點校本。
- 史澄、何若瑤總纂，同治《番禺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6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據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影印。
- 史澄、李光廷纂，光緒《廣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1-3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據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影印。
- 全祖望，《鮚埼亭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抄本影印。
- 尚久蘊、尚世讓、尚文化主修，《尚氏宗譜(1675-1994)》第六次續修，遼寧省新聞出版局批准出版，1994。
-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收入《廣東叢書》，第2集，香港：商務印書館，1947，葉恭綽輯錄、整理、校勘本。
- 屈大均撰，陳永正等校箋，《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洪全福，《討清檄文》，收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142-143。
- 約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原著，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莊國土著，《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 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徐鼎，《小腆紀年附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咸豐十一年(1861)原刊本點校。
-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第12冊，臺北：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86。

- 梁紹獻等纂，同治《南海縣志》，收入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第 35 輯 史部方志類第 37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9，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一年(1871)羊城內學院前翰元樓刻本影印。
- 陳世英等纂，《丹霞山志》，收入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107-108 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據清康熙年間稿本影印。
- 鈕琇，《觚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7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臨野堂刻本影印。
-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 福隆安等續纂，《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廣州市文物志編委會編，《廣州市文物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0。
- 廣州市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主編，黃兆輝、朱廣編撰，《駐粵八旗史料彙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
- 衛匡國(Martino Martini)著，何高濟譯，《韃靼戰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
- 魯可藻，《嶺表紀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據浙江圖書館藏傳以禮校本點校。
- 戴笠，《行在陽秋》，收入《明代野史叢書》之《三朝野記（外四種）》，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 檀萃、凌魚纂修，乾隆《番禺縣志》，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168 冊廣東府州縣志第 3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據院藏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影印。
- 羅振玉校錄，《平南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68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據民國十三年(1924)東方學會出版《史料叢刊》本影印，頁 357-420。
- 釋今釋，《徧行堂集》，收入陳建華主編，《廣州大典》，第 56 輯集部別集類第 17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9，據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
- 釋今釋撰定，尹源進、李棲鳳校訂，《平南王元功垂範》，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68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據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影印。
- Azevedo, Manuel de. *Relação das guerras, e levantam.<sup>tos</sup>, que Ouve na China, morte do seu éperador, e entrada dos Tartaros nella, desde anno da 1642 até o de 1647, do Visitador da Prov.<sup>a</sup> de Jappão, E da Vice Prov.<sup>a</sup> da China*. Biblioteca de Ajuda (葡

- 葡萄牙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 *Jesuitas na Ásia*(《耶穌會士在亞洲》檔案), 49-V-13, fls. 1-49; ARSI(羅馬耶穌會檔案館), Jap.-Sin. 126, fls. 79-127.
- Canevari, Pietro. *Carta Annua da China, A. 1651*, 31 Dezembro, 1651, Camcheu. Biblioteca da Ajuda, *Jesuitas na Ásia*, 49-V-61, fls. 111-118v.
- Du Halde, Jean Baptiste.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London, 1738.
- Martini, Martino.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by the Invasion of the Tartars*.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Crook, 1654.
- Navarrete, Domingo.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 London, 1704.
- Nieuhof, Johanne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delivered by their excellencies Peter Goyer and Jacob de Keyzer*. London, 1673 second edition.
- Nieuhof, Johannes. *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 Leyde: Jacob van Meurs, 1665.
- Nieuhof, Johannes. *The Embassy of the Netherland East-India Company*, translated by John Ogilby. London, 1669.
- Semedo, Álvaro, *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tomou*, 1653, Biblioteca da Ajuda, *Jesuitas na Ásia*, 49-V-61, fls. 252v-260, 668-675v.

## 二、近人論著

- 王小夢，〈海城尚氏宗譜文化探析〉，《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4：1(齊齊哈爾，2014)，頁 100-102。
- 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構建——以章太炎為例〉，收入王汎森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71-87。
- 王國維，〈庫書樓記〉，收入羅振玉輯，《史料叢刊初編》，收入于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第 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 131-135。
- 王萌筱，〈權力的場域：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在廣東的寺廟建設及其權力運作〉，《勵耘

- 學刊(文學卷)》，2014：1(北京，2014)，頁150-168。
- 李治亭，〈《尚氏宗譜》與三藩史實考辨〉，收入《明清論叢》，第1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頁122-134。
- 李建青，〈廣州十八甫得名的來歷〉，《民俗》，67(廣州，1929)，頁15-16。
- 沈定平，〈明朝覆亡歷史與章太炎民族革命論〉，收入中國明史學會編，《明史研究》，第14輯，合肥：黃山書社，2014，頁282-297。
- 林子雄，〈清初兩藩攻佔廣州史實探微〉，《嶺南文史》，1996：3(廣州，1996)，頁8-11。
- 查理斯·德雷格(Charles Drage)著，潘一甯、戴甯譯，《龍廷洋大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 段志強，《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 孫文良、李治亭，《明清戰爭史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 細谷良夫，〈《平南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の原本について〉，《滿族史研究通信》，7(東京，1998)，頁1-16。
- 陳賢波，〈清代平定華南海盜戰爭(1790-1810)的官方紀念與歷史書寫〉，《清史研究》，2022:4(北京，2022)，頁49-64。
-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 董少新，〈明末奉教太監龐天壽考〉，《復旦學報》，2010：1(上海，2010)，頁35-44。
- 董少新，〈淺談全球史的史料問題——以明清鼎革史的西文原始史料為中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8：5(北京，2018)，頁38-45。
- 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 羅一星，〈清初兩藩肆虐廣州考〉，《廣州研究》，1984：1(廣州，1984)，頁57-62。
- 羅振玉，〈史序〉，收入羅振玉輯，《史料叢刊初編》，收入于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第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129-130。
- 顧誠，《南明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
- Bowra, E. C.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anton,"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1:2 (September 1872): 86-96; 1:4 (February 1873): 228-237.
- Drage, Charles. *Servants of the Dragon Throne: Being the Lives of Edward and Cecil Bowra*. London: Peter Dawnay, 1966.
- Pina, Isabel Murta. "In the Eye(s) of the Storm(s): Álvaro Semedo, an Observer of Two Dynastic Transitions in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 *Ming Qing Yanjiu* 26 (2022): 172-193.



### 三、網路資料

遼寧省圖書館特藏部藏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編號：遼圖 31842. 參見：  
<http://shang2.zupu.cn/wenhua/337046.jhtml>, 擷取日期：2024年11月10日。

## Primary Sourc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A Study of the Fall and Massacre of Canton in 1650

Shao-xin Dong

Professo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The fall and massacre of Canton by the Qing army in 1650 is documented in three main primary sources: Shang Kexi and Geng Jimao's *Memorial of the Re-conque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1650), Wang Minglei's *Memorial Tablet for the Deceased* (ca.1650s), and Portuguese Jesuit Álvaro Semedo's report (*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tomou*, 1653). Each author was a direct witness to this catastrophe, representing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nquerors, the defenders of the city, and European observers and "bystanders." Thus, each source emphasizes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event, reflecting the unique viewpoints of its author. These three foundational documents gave rise to three distinct documentary traditions; each author's perspective shaped distinct historical memories of the catastroph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tent and differing emphases of these three primary sources, traces their evolution in later generations, and analyzes how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varied historical memories surrounding the fall and massacre of Canton in 1650.

**Keywords:** the Canton Massacre, primary sources, source positioning, historical memory